

对中苏分裂的反思

远航一号 著

·二零二四年二月·

对中苏分裂的反思

远航一号 著

引 言

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和苏联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由分歧发展到分裂和对抗，最终导致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失败、世界范围的反革命浪潮猖獗一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也是进步人类解放斗争史上的悲剧。

今天，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再一次由低潮走向高潮。中国的无产阶级正在积蓄力量，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展现其伟大的革命首创精神，将日渐腐朽的中国资本主义埋葬在历史的垃圾堆中。为了迎接未来的革命高潮，有必要认真总结以往革命失败的教训，包括国内斗争方面的教训和国际斗争方面的教训。如何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从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最高利益出发，重新回顾当年的中苏分歧、论战和分裂，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熟悉红色中国网的读者知道，在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看来，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是带有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日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9年）

二十世纪中期，美帝霸权仍然如日中天，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现了空前繁荣，绝大多数国家的无产阶级化进程才刚刚开始，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还生活在农村，世界范围的环境危机刚刚开始发展，全球生态系统仍有着相当的承受能力。就这些客观历史条件来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在当时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就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自身来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在充分发动无产阶级、劳动农民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这样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其领导集团主要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阶级属性属于近代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知识分子组成；虽然领导集团中也包括了一些来自于无产阶级、劳动农民的优秀分子，但后者在领导集团中并不占主导或核心的地位。

当这样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初步的革命胜利、夺取了政权以后，由于没有（而在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必然产生一个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实际占有生产资料并享有物质消费特权的官僚特权集团。又由于作为激进民族解放运动产物的社会主义国家（红色中国网始终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围着，因而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与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即帝国主义国家）展开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竞争，并将剩余产品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久而久之，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继续存在并发展的大前提下，世界资本积累的规律不可避免地要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契约无法再维持下去，从而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就以上的意义来说，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一向主张，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发展变化是人类历史前进或倒退的根本原因。我们虽然主张，一个时期的历史发展，在其重大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方面，是由当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物质生产条件在各方面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我们并不否认历史偶然性的作用，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更不否认，在一定客观历史条件约束的范围内，某些领袖人物对于历史的走向承担着某种特殊的个人责任。毕竟，“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尽管“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倘若中国、苏联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走上分裂、对抗的不归路，美、欧、日帝国主义后来就无法通过剥削中国的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世界资本主义就有可能无法顺利渡过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利润率下降危机。越南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以后，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再与遍布亚非拉的进步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就可能在与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中占得上风，实现毛主席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进而取得世界范围的胜利。

等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土崩瓦解，在世界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有资本积累的压力，并且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也已经发展壮大。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条件，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斗争下，就有可能一方面限制官僚特权集团的“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将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全部或大部用于劳动时间的缩短，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最终奠定无阶级社会的基础。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更不能推倒重来。我们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努力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其目的，不是为了苛责古人，而是为了探索革命斗争的规律，与当前的斗争实际相结合，力争在未来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我们更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只不过是国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最终仍然是要半途而废的。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仍然存在，民族国家就仍然是客观现实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反对一切无视劳动群众朴素爱国感情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的一切斗争，必须从中国无产阶级而不是外国无产阶级的特点和优点出发。但是，我们斗争的最终目的，不仅要打倒中国的资本主义，更要打倒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也只有打倒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才能消灭各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客观物质基础。

这组系列文章打算梳理、总结1949年至1976年期间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于笔者的时间、精力有限，这种梳理、总结还只能是初步的，只能对两党、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一些大的、最重要的事件进行探讨，并且也只能探讨其中最主要、最本质的方面，无法涉及所有的历史细节，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以及一些片面的和偏颇的地方。这些不足，还要请读者予以谅解，并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中苏同盟

1949年12月，毛主席开始了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旅程；次年2月，中苏双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奠定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关系的基础，也是影响当时国际政治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既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成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反映。在此期间，苏联共产党的国际斗争策略、苏联的外交政策都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布尔什维克党的世界革命策略仍然是以俄国革命的胜利来引起整个欧洲的革命，再以欧洲革命的胜利来引领世界革命的胜利。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最初就是为了实现这样一种世界革命策略。然而，1919年初，德国革命失败；同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1921年，苏联红军进军华沙功败垂成。此后，欧洲工人阶级革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1923年3月，列宁在其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未来世界革命的希望不在西方而在东方：“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些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它们完成

这一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一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

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中，列宁思考的问题是，在欧洲革命已经失败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与世界革命的前途在哪里。经济上落后的苏维埃政权能不能坚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列宁笔锋一转，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属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将“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就是说，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条件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成熟，而是通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通过“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这就是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靠他们自己，大概是进行不了社会主义革命了，但是生活在世界东方的“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因为处于被帝国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状态，必然要加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正是世界东方人民的斗争，才使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有了“完全和绝对”的保证。

1920年9月，共产国际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召开了东方被压迫民族代表会议，标志着共产国际和苏联高举起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

到了1923年，孙中山在多年来向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国内军阀乞求援助都碰得头破血流以后，终于决定接受苏联的援助

并实行国共合作的新政策。1925-1927年，中国革命出现了空前的高潮，中国共产党发展为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党。

从1927年至1945年，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官方史学以及自由派反动文人贬低、诋毁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夸大少数领袖的个人作用，用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这里，限于篇幅，不去逐一澄清其中的历史细节，仅就几个大的阶段来说明一下苏联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就不会有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就不会有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也很难发展为一个全国性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就不会有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中国近代第一支真正的民族革命武装（“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也就不会有后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和红色武装割据。中国人民将不可避免地要在黑暗中摸索漫长的时间。

第二，在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是国际上唯一一个向中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的国家。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以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完全有可能在抗战初期就失败、投降，甚至根本不敢开始全面抗战。如果是那样，当时偏居西北一隅的中国共产党将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不能排除失败的可能。

第三，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东北根据地进而取得全国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一点，下面再进一步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以后，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将取得最终胜利，已经毫无疑问了。此后，斯大林开始着手安排苏联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1943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宣告共产国际解散。1944年起，苏联不再以《国际歌》为代国歌，而是采用以“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牢不可破”为首句的新国歌。这两个决定，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当时苏联共产党的正式名称是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将不再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革命作为近期的和直接的政治目标，而是准备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和平共存。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大国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签订了《雅尔塔协定》。《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自在欧洲的势力范围。通过雅尔塔协定，苏联事实上承认了美国在战后世界体系中的首要地位；美国则承认东欧和东北亚的一部分地区是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不再支持西欧和南欧各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导致希腊革命失败。另一方面，斯大林坚决捍卫了东欧各国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保卫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其间的功过是非，可以另外讨论，这里不再评说。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承诺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之内，开始对日本的战争。1945年6月，以宋子文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开始与苏联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号称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土崩瓦解。8月15日，王世杰、莫洛托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国民党政府声明：“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之边界为边界。”此外，两国政府分别签订了关于旅顺、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原名中国东省铁路即“中东路”，即满洲里至绥芬河之间的铁路线）等问题的协定。这些

协定规定，旅顺作为中苏两国共用的海军基地（实际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辟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实际上由苏军占领，而市政府由中共掌握），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管。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直是高度评价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资产阶级官方史学和自由派反动文人利用落后群众中的狭隘民族情绪，煽动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仇恨，拼命鼓吹所谓苏联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政治事物都是有阶级性的。领土和主权也不例外。众所周知，早在1921年，蒙古人民就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在1945年，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承认外蒙古独立，符合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长远利益。

至于苏军占领旅顺、大连，后来的事实发展也证明，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早日胜利。

如果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苏军没有出兵东北，日本关东军保持完整，那么，即使在日本投降后，日本关东军将很可能只向国民党政府投降，甚至将旅顺、大连交给美帝。如果是那样，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攫取了东北的工业资源和粮食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武装将处于十分困难的局面，其在关内的各个根据地将面临着国民党军队分别从华中、华东和东北三面夹击的危险，甚至重蹈中原大战中阎冯失败的覆辙。

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出兵东北，在抗日战争结束的历史转折关头，给予了中国革命第三次重大的、决定性的帮助。

1949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在新的形势下，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生的人民民主国家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崭新关系。1949年6月，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表示，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将是“一边倒”，“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它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年12月，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启程前往莫斯科，为斯大林祝贺七十寿辰。此后，双方开始了围绕两国关系新的条约的谈判。由于中苏两党各自的革命历史不同、斗争经验不同、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不同，主要领导人在性格和文化习惯方面之间存在差异，谈判不可能是完全一帆风顺的，谈判过程中有一些曲折和反复也是正常的现象。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的官方史学和影视作品往往夸大这些差异和分歧，宣扬所谓共同的“意识形态”是不可靠的、只有“国家利益”才是最真实的，不仅为了抹黑苏联社会主义，更是妄图扼杀劳动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渴望。

年2月，周恩来、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确立了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规定双方共同致力于反对日本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的侵略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中、苏两国都没有参加由美帝一手把持的与日本之间的《旧日金山和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直到1978年才与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没有解决钓鱼岛问题。俄罗斯联邦至今没有与日本缔结和平协定。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同时，中、苏双方还签署了其他协定。按照这些协定，苏联方面承诺在1952年之前从旅顺、大连撤军并将中国长春铁路的权益移交给中国方面；后来，应中国方面要求，苏联从旅顺、大连撤军的时间推迟到了1955年。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五十年代初国际政治的大事件，标志着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阵营完全形成了，对方兴未艾的亚非解放运动和全世界进步人类都是极大的鼓舞。

条约签订时，朝鲜战争尚未爆发。但是，条约所确立的中苏同盟关系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条约签订后，苏联政府向新中国提供了第一笔贷款，开始了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大规模援助。

二

苏共二十大

中苏联盟建立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当时称之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巩固壮大，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1953年，朝中人民共同取得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1954年，越南人民的抗法救国战争取得胜利。

奠边府大捷后，越南劳动党（越南共产党在当时的名称）领导人很想一鼓作气，一举解放全国大部分地区。不过，在1954年4月至7月的日内瓦会议上，以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共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做工作，最后，促使越南代表团相当不情愿地接受了按照北纬十七度的临时军事分界线将越南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的停战方案。后来，南越吴廷琰集团在美帝支持下撕毁日内瓦协议，拒绝在越南南方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并与北方统一，并在越南南方迫害、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越南劳动党因为恪守日内瓦协议，直到1959年才决定在越南南方恢复武装斗争；在此之前，越南劳动党在南方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蒙受了巨大损失。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至死都没有看到祖国的统一。对此，越南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有所埋怨和不满的。据西方史料，越南领导人私下里认为周恩来出卖和背叛了他们。

日内瓦会议期间，国际形势十分微妙，苏联和中国的国际斗争经验要比越南丰富，对于谈判艺术的把握也更高明一些。但

是，这个例子也说明，不同国家的革命政党在相互配合、共同斗争中，由于理解问题的方式、方法有差异，也由于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不尽一致，如果处理不好，是很容易产生误会乃至埋下相互怨恨的种子的。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联合起来，逮捕并处决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此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分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免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赫鲁晓夫成为无可争议的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苏联继续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苏联共援建中国156项重点工程（后来实际建成150项；包括国防工业44项、冶金工业20项、能源工业52项、机械工业24项、化学工业9项和轻工业1项），不仅向中国提供了大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还派出大批专家，无偿转让了大量技术，并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现代工程技术人员，帮助中国奠定了现代工业的基础。对此，1981年，陈云仍然感慨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实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中国一台。”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来自全世界55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做了总结报告。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又向大会做了题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严厉批判了斯大林。关于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争论，我们在以后的文章中再做介绍。这里，主要介绍赫鲁晓夫对大会所做的正式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

在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一开始就讲：“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已越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而变成了世界体系。”赫鲁晓夫介绍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成就，认为无论是苏联还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都大大超过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介绍说，苏联正在帮助各人民民主国家建设391个企业和90多个独立车间（其中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156个企业和21个独立车间）。

赫鲁晓夫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资本主义总危机”是斯大林在1927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仍然在加深。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有所增长，但这些增长，是依靠军备扩张和国民经济的军事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的扩张、因为战争破坏而带来的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以及对劳动人民的加紧剥削。赫鲁晓夫驳斥了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已经过时的观点，认为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增长的各种特殊因素只能暂时起作用，国家调节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赫鲁晓夫注意到，由于西德和日本的经济复苏，正在引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而发生新的矛盾。

赫鲁晓夫指出，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广泛和尖锐”的罢工运动，罢工的次数和参加罢工的人数都超过了战前。赫鲁晓夫特别提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结束军备竞赛”。

在分析国际形势时，赫鲁晓夫认为，“今天的世界上决不是一切都受垄断资本集团的支配”，“社会主义、民主、和平力量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不断加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地位更加巩固了……社会主义的国际阵营对世界局势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帝国

主义的殖民体系日益瓦解，出现了一个包括欧洲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爱好和平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地区”，这个“和平地区”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反对战争。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中一些“较有远见的代表人物”不得不考虑到这些情况，承认战争冒险政策的破产。“如果资本主义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它将在这一战争中找到自己的坟墓……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可战胜的！”

然后，在“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一节中，赫鲁晓夫提出了后来被中国方面概括为“三和路线”的一系列观点：

赫鲁晓夫认为，由于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是可以长期“和平共处”的。由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帝国主义不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尽管反动势力仍然企图进行军事侵略和冒险，但战争不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苏联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大国之间的关系”、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与美国“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和平共处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不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武装干涉，而是通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和平竞赛”中显示出带有决定性的优越性，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劳动群众中深入人心。

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是不同的。暴力和内战不是社会革命的唯一途径。由于历史条件的根本变化以及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可以“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

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

上面，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来介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总结报告并引用了赫鲁晓夫的一些话，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当时苏共领导的思想状态；这些思想状态，与后来中国马列主义者所理解的刻板的“修正主义者”的印象是不完全一致的。

后来，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即著名的“九评”中的第一评）中，曾经专门提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关于中苏两党围绕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争论，以后还会再详细介绍。这里，先说明一个中国的马列主义者比较容易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整个欧洲遭到了空前巨大的伤亡和损失，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丧失了大量青壮人口。苏联军队和平民的伤亡总数达到5000万（其中死亡2700万），相当于战前苏联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虽然也伤亡巨大，但是占总人口的比例要小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欧洲国家还是社会主义的欧洲国家，广大人民群众都普遍珍惜和平、极端厌恶战争。对于这样的思想情绪，刚刚从长期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中国革命领导人未必能完全理解。

三

斯大林问题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向大会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关于个人崇拜：赫鲁晓夫报告说，斯大林利用《斯大林传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大肆颂扬个人功绩，利用颁发“斯大林奖”，树立“斯大林纪念碑”以及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企业和城市来助长个人迷信。赫鲁晓夫还提到了列宁于1924年5月给俄共（布）十三大的信，信中批评了斯大林，说他“太粗暴”，建议调动他的总书记职务。他同时还公布了列宁1923年3月5日给斯大林的信，信中列宁要求斯大林为他在电话中侮辱、唾骂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粗暴行径向列宁夫妇赔礼道歉，否则列宁就要和他断绝关系。

关于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治、实行大清洗：赫鲁晓夫报告认为，斯大林利用“人民公敌”的罪名镇压党内反对派，将思想斗争转变成对反对派肉体上的消灭。赫鲁晓夫列举诸多材料，证明斯大林批准内务部违法使用肉刑，指责斯大林借追查基洛夫案件的凶手为名发动大清洗、趁机消灭反对派是“贼喊抓贼”，甚至说斯大林晚年“有一个消灭苏共中央政治局内所有老同志的计划”。

关于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错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盲目自大，过度轻信苏联与希特勒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相信诸多有关纳粹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再加上“大清洗”期

间的政治运动残害了很多优秀的苏联红军将领，以至于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遭受惨败。在纳粹德军对苏联的突袭取得初步成功之后，斯大林又对苏联的最终胜利完全丧失了信心，认为“一切都完了”，甚至“完全撒手不管”。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斯大林“按照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导致苏军在哈尔科夫战役中失败并遭受严重损失。

关于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在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强行将车臣一印古什、卡尔梅克等几个民族集体迁徙到远方，同时取消了这些民族的自治共和国，这种野蛮和非人道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对立和民族矛盾，影响了苏联的社会稳定。

关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战后苏联、南斯拉夫两国发生了严重的纠纷。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导致两党两国关系完全破裂。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在这方面扮演了“可耻的角色”；斯大林甚至声称，“只要我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

关于斯大林在经济政策方面的错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完全不了解农村情况，几十年不访问农村，“只是从电影上看农村和农业”，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苏联农业落后。

关于斯大林实行个人独裁、破坏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没有按照党章规定按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间相隔了15年；党的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也很少召开。斯大林晚年不仅不开中央全会，连政治局会议也只是偶尔去几次。同时斯大林架空中央政治局，党内重要事务被所谓“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等小组把持。赫鲁晓夫讽刺这些小组就像“扑克牌迷的术语”。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国际共运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中引起了恐慌。报告内容随后被以色列情报

部门窃取，又转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56年7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在国际上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但是，应当说，按照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历史资料，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所涉及的关于斯大林严重错误的具体事实，绝大部分是真实的。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的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特别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其中有一些段落，是毛主席亲笔添加或修改的。

社论头一段肯定了苏共二十大所通过各项决议中的主要观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国际关系和国内建设的新经验，作出了关于坚定地执行列宁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可以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苏维埃的民主制度、贯彻遵守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批判党内的缺点、规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等等一系列的的重大决定。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然后，文章指出，以往，没有一个剥削阶级的政党会在人民群众面前主动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苏联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才敢于在群众面前做自我批评，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在现在一切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当权政党或者政治集团敢于在自己的党员群众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认真地揭露自己的严重错误。工人阶级的

政党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党，对于它们说来，实行自我批评，除了失掉错误以外，什么都不会失掉，而所得到的却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谈论苏联共产党关于个人崇拜的自我批评。他们说：好！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共产党居然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还是一个有很大声名和荣誉的领导人斯大林犯了这样的错误。反动派以为他们现在是抓住了一个能够用来中伤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把柄了。可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什么著作中曾经说过我们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或者曾经说过某一个共产党人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呢？”

今天再读这段话，不得不说，其中除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应用，也包含了一些把坏事变好事的中国式“智慧”。

文章认为，斯大林在晚年确实犯了一些严重错误：“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

文章总结了几点斯大林犯下严重错误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生事物，“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没有经验可循，不可能不犯错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

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有责任尽量少犯错误，避免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发展为全国性的、长时期

的错误。但是，当斯大林“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荣誉的时候”，他骄傲自满了，脱离群众了，“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他的实践违背了他自己的理论，“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

文章继续探讨了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旧社会的腐朽的、带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残余，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既然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也就有可能给予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以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物也受了这种影响。”

文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将群众路线与党的领导相结合的经验，然后表示：“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文章批判了那种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的观点：“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党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图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

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这篇社论（后来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合称为“两论”）的一些主要特点是：在大的、抽象的方面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强调斯大林的历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并在肯定斯大林功绩的同时，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主要内容（依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完成国家工业化以及农业集体化）。

对于斯大林的错误，《人民日报》编辑部认为，首先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新生事物，缺乏经验，不可能不犯错误；其次是因为斯大林取得了很大成绩以后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和客观实际，从而违反了他自己的理论（这样就间接地肯定了斯大林的理论）。关于“个人崇拜”，《人民日报》编辑部则认为这主要是由旧社会的腐朽思想所带来的“习惯势力”的影响造成的。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在报告中，刘少奇在谈到苏共二十大时说：“今年二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邓小平说：“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八大通过的党章在提及党的指导思想时，仅提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对于中共八大以及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对苏共二十大的肯定，中共方面后来解释说，当时中共没有公开否定苏共二十大，是为了顾全大局。“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

然而，肯定苏共二十大的文字确实见诸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文件，《人民日报》编辑部的社论也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毛主席亲自审阅并修改的。共产党人做事的原则是坚持真理，襟怀坦白，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1956年时，苏联和苏共又不是敌人，不存在为了迷惑阶级敌人掩盖自己真实意图的问题。如果说，当时中共公开肯定苏共二十大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的面子，那么中共领导岂不是承认自己是在违心说假话、欺骗了国内外群众吗？所以，后来在中苏论战时，苏方指责中共在二十大问题上出尔反尔是有一定的文字根据的。

对斯大林怎样评价，是在讨论国际共运史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在这组系列文章的引言中，已经说过，红色中国网认为，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图家并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是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特殊历史产物。这样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虽然是依靠充分发动无产阶级、劳动农民才取得了胜利，但并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也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在中苏论战爆发后，中共的官方观点是认为赫鲁晓夫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得苏联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修正主义国家，又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早在斯大林时期，苏维埃民主就已经不复存在，一个脱离劳动人民

又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的官僚特权集团就已经形成了，赫鲁晓夫的各种“修正主义”内外政策或多或少都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期。

尽管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国家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们都是有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广泛参与的社会革命的产物。在社会主义苏联，劳动人民享有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相对于资本主义有无比的优越性和进步性。

社会主义苏联，在其存在的整个时期，支援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支援了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给帝国主义阵营以沉重打击，推动了人类历史向前发展。

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因为官僚集团的瞎指挥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毕竟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和共产国际指导了各国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有力地帮助了亚非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为打倒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这些方面，斯大林的功绩都是不可磨灭的。

另一方面，斯大林又是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领导人。作为这个集团的总代表，他不可避免地要维护官僚集团的权力和特权，并代表官僚特权集团对劳动人民以及官僚特权集团内部的某些反对派进行专政。在国际上，斯大林对帝国主义有妥协的一面，并且在某些个别情况下，有过迫害乃至杀害其他国家革命领导人的行为。当他作为官僚特权集团的总代表镇压劳动人民反抗或者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阻挠其他国家革命的时候，斯大林在历史上就起着倒退的或者反动的作用。

对于斯大林作为官僚特权集团总代表的历史本质，无论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社论，在当时都是不可能予以揭露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也不是为了改变官僚

特权集团的统治，而是因为斯大林后期，斯大林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搞得官僚集团上层人人自危，生命和财产都没有保障。整个苏联的官僚集团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相对稳定的官僚特权制度，改变原来那种朝不保夕的状态。所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官僚集团乃至一部分东欧官僚集团中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此外，赫鲁晓夫集团也希望通过在思想政治领域适当放宽的“解冻”政策来安抚、讨好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小资产阶级（即“知识分子”群体）。

但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过于急切，倾泻了大量个人情绪和私愤，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声誉，而且还威胁到了官僚特权集团统治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共产党出面，来肯定斯大林的功绩，某种程度上淡化斯大林的错误，尤其是将斯大林的错误与“社会主义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就是官僚特权集团统治的制度）做了区分，既符合国际共运的整体利益，也符合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官僚集团的利益和愿望。所以，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功、过二分法（后来概括为所谓“三七开”，即认为斯大林七分功劳、三分错误）以及围绕斯大林问题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当时的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客观上帮赫鲁晓夫解了围。对于中共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主张，只有少数历史上与斯大林矛盾较深的国家（如南斯拉夫）不满意。

另外，赫鲁晓夫下台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也采取了一些部分恢复斯大林名誉的措施。

四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以后，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中都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先后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十月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1956年6月28日，波兰波兹南的一万多名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在游行过程中，有反革命分子造谣说工人们派往华沙的代表被逮捕，导致游行演变为暴动，烧毁了政府安全部门大楼。波兰政府出动军队和坦克镇压，平息了暴动。在骚乱过程中，群众有较大伤亡，几十人死亡、上千人受伤。

七月下旬，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七中全会。在全会上，当年三月刚刚接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奥哈布提议给哥穆尔卡平反并选举其为新的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是波兰的老共产党员，战前曾在反对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两度坐牢；1943年至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1948年，在斯大林授意下，哥穆尔卡因“右派民族主义倾向”被免去第一书记的职务；1949年，哥穆尔卡被开除出党。

当时，波兰的国内政治形势极为混乱。全国各个城市都有集会示威活动。混在群众中的反革命分子提出了“打倒共产主义独裁”、收复“东部领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苏联一部分的白

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地区)等反动口号;反革命分子推倒了红军战士雕像,撕毁红旗、破坏建筑物上的红星标志。

10月19日至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19日凌晨,赫鲁晓夫率领由他自己和米高扬、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科涅夫组成的苏共中央高级代表团飞抵华沙,与波党中央展开谈判。与此同时,波兰境内的苏联红军进行了战备动员并开始向华沙集结。波兰方面警告苏联方面说,如果苏联试图以武力解决问题,波兰军队将进行抵抗。

经过紧张的谈判,苏联方面同意哥穆尔卡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新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保证,波兰方面无意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或退出社会主义阵营,“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

过去有一些资料认为,中共在阻止赫鲁晓夫武力干涉波兰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根据沈志华整理的资料,这样的看法不确实。中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在波党二届八中全会后在苏联、波兰之间进一步斡旋调解,尤其是劝说波兰方面顾全大局,允许苏联在波兰继续驻军。

1956年十月下旬,匈牙利局势恶化。10月23日,首都布达佩斯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暴动群众夺取了枪支,占领了广播电台。当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纳吉·伊姆雷为新的部长会议主席(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劳动人民党;纳吉是所谓党内“改革派”的领袖,曾在1953年至1955年任部长会议主席期间推行农业私有化)。10月24日,苏军进入布达佩斯,试图控制市内各主要目标,但与武装起来的群众以及发生叛乱的部分匈牙利军队发生冲突,未能有效控制局势。

10月28日，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自10月23日开始的群众暴动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人民民主运动。纳吉与当时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后来曾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进行了会谈，并征得赫鲁晓夫同意，匈、苏双方决定停火。30日，纳吉宣布废除一党制，成立多党联合政府。

10月23日至30日，苏共中央最高主席团多次开会讨论匈牙利问题，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30日，苏共中央发表宣言，表示愿就“匈牙利领土上的苏军地位”与匈牙利政府进行谈判，初步做出了从匈牙利撤军的决定。

然而，一天后，布达佩斯发生了共和国广场事件，一群反革命武装分子包围了劳动人民党布达佩斯市委大楼，杀害了市委书记和几十名劳动人民党的干部。

此前，由于波兰、匈牙利局势恶化，由刘少奇、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0月23日到达莫斯科，与苏方随时保持沟通。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中方的意见也几度发生变化。直到30日晚，中方才给出了希望苏军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的明确意见。应苏方邀请，刘少奇参加了苏共中央最高主席团会议，表达了中方意见。31日，苏共中央最高主席团终于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匈牙利的反革命动乱。此外，苏联方面也征求了其他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以及南斯拉夫的意见；铁托也表示支持苏联采取果断措施。

11月1日，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匈牙利为中立国。当天，在斯大林时期曾经受迫害、此前几天刚刚接任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职务的卡达尔宣布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解散，另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卡达尔随后离开布达佩斯并前往莫斯科。

11月3日，苏军包围了布达佩斯。4日凌晨，苏军突入布达佩斯市内，当天上午基本控制市内局势。匈牙利各地暴乱分子和叛军的抵抗仍然持续了数天，有些地方发生了激烈战斗；在整个暴动过程中，有数千人死亡、数万人受伤。

11月4日，卡达尔通过广播宣布成立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纳吉一度躲进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后来被匈牙利政府逮捕并判处死刑。

在波兰、匈牙利事件期间，中国方面对苏联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并在关键时刻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对于顺利解决波兰事件、平息匈牙利反革命暴乱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

波兰、匈牙利事件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大大提高。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社论。这篇社论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帝国主义在侵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各国无产阶级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不但符合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和全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既要反对国际共运中的“大国主义”，也要反对较小国家中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某些东欧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抹煞苏联的贡献。”

在讲到反对帝国主义进攻与和平共处之间的关系时，文章说：“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

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文章肯定了苏联革命的巨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并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概括为“十月革命的道路”，并且说，“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

文章第一次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观点：“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

文章明确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反对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乃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

二位的地位。“文章点名批评了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其他领导人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分子”的言论。

文章认为，既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文章指出，否认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民族特点、照搬苏联经验，就会导致教条主义；但是，“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就必然导致修正主义。

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应当依靠群众，实行“群众路线”，但绝对不可以“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文章的这些观点，如果抛开其字面上的意义，而将这些字面上的词句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对照物结合起来（比如，坚持“党的领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意味着维护官僚集团的特权地位），反映了中共领导集团在当时的历史局限性。

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虽然给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当时的世界革命形势，总的来说，还是在向前发展的，国际力量对比仍然在向着对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力量有利、对帝国主义阵营不利的方向变化着。

五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1957年11月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四十周年。毛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第二次访问苏联并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毛主席在访问苏联期间，接见了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实习生和中国驻苏使馆工作人员。在接见时，毛主席一开头便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段振奋人心的话，鼓舞了几代革命青年，今天，仍然激励着新一代中国马列主义青年。

十月革命庆典结束后，来自全世界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公开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另有来自四个国家的共产党秘密出席了这次会议。

11月18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讲话中，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势力占了压倒的优势。”

毛主席重申了“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的观点：“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

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可以说，毛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精髓。

毛主席讲了十件事，来说明世界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毛主席特别赞扬了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个人造卫星：“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

毛主席豪迈地表示：“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

但是，在讲到未来世界大战的危险时，毛主席讲了这样一段话：“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对于毛主席的这段话，当时在现场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为之震惊，甚至感到恐慌！

熟悉中国革命传统以及毛主席著作、讲话的中国马列主义者，在谈毛主席这段话时，自然不会感到特别诧异。知道毛主席的本意并不是真的不惜全世界死掉一半人也要与帝国主义进行世界大战，而只是从最坏的可能出发，劝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思想上不要害怕战争，做好最坏的准备，努力争取好的结果（和平、不打仗）。

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像毛主席那样透彻地掌握唯物辩证法。就是在今天，在中国的马列主义者队伍中，只要遇到新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又有多少人敢说自己就掌握了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而毛主席当时可是对着来自几十个国家、成百上千他素未谋面（也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相互了解）的外国共产党人在讲这番话，而且又是通过翻译！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一个过去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中国同志，头一次出国，在大会上通过翻译来听某个外国同志讲话，能一下子就把所有话的里里外外（字面意思和隐含意思）、前后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哪些是在讲个别情况、哪些是在讲普规律，哪些是表面、哪些是本质，哪些是直白叙述、哪些是隐喻引申，都搞得一清二楚吗？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位头一次出国的同志，肯定只能是先听几个关键句、抓住几个重点词，然后连蒙带猜地揣一下外国同志讲话的主旨。而毛主席那段话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肯定是诸如“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一类句子，而绝不会是后面毛主席所说的“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等需要较深入思考才能够体会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一段话，后来引起了很多误解，造成了很多麻烦。应当说，无论毛主席的本意如何，在国际场合这样讲话，是比较轻率的，是不了解国际宣传工作特殊性的表现。作为马列主义积极分子，无论是在对一般群众做宣传时，还是在对与自己斗争经验很不同的同志说明情况时，最忌讳的，就是将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来的自以为是显而易见的东西，立即就不问青红皂白地希望或要求别人接受。我们日常生活中，因为讲话不当，引起朋友或同志误解、弄不好反目成仇的情况，都不免发生，何况是在那样重大的国际场合呢？

11月16日，与会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签署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即著名的《莫斯科宣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团没有在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上签名，只参加了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签名的《和平宣言》。

《莫斯科宣言》是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一致的结果。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宣言》的起草工作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宣言》首先指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波”。《宣言》指出，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还有七亿多人摆脱了殖民枷锁，建立了民族独立的国家；帝国主义已经丧失了对大多数人类的统治，帝国主义的体系正在分崩离析。

在论述决定世界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时，《宣言》认为，“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过程。”“四十年来，社会主义证明了它是比资本主义远为优越的社会制度。它保证了生产力以资本主义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保证了劳

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帝国主义各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国家里，暂时仍然保持着的比较景气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军备竞赛和其他暂时因素的不巩固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避免新的、深刻的震动和危机。”《宣言》中的这些论述与苏共二十大关于社会主义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的设想相一致。

在论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时，《宣言》认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如果在未能缔结禁用核武器的协定的情况下发生世界战争，那么，它就必将是一场破坏力空前巨大的核武器战争。”这里，对核战争破坏性的强调，是与苏共对争取和平斗争的重视相一致的。

《宣言》认为，“是战争还是和平共处，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当前全世界最重要的斗争是保卫和平的斗争。”认为当时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认为共产党、工人党和一切进步力量最主要的斗争任务是“保卫和平”，这些，都是与苏共二十大纲领相一致的。

《宣言》指出，“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增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站在反帝立场上的爱好和平的亚非国家、国际工人阶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构成了强大的和平力量。“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认为和平力量的增长，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是与苏共观点相一致的。

《宣言》继续指出，“根据当前条件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关于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各国共产党认为争取和平的斗争是自己的首要任务。”这段话，以正式文件

的形式，将苏共二十大所制定的“和平共处”路线进一步确立为整个国际共运的路线。

《宣言》在叙述社会主义阵营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时，继续采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在《宣言》起草过程中，苏联方面曾经提议，采用“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中国方面谢绝了。尽管如此，在五十年代的最后几年，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在说到社会主义阵营时，往往会说“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宣言》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特点和传统结合起来。《宣言》概括了“普遍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规律。”《宣言》认为，既要反对“机械地抄袭他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也要反对“夸大（民族）特点的作用，借口民族特点而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宣言》的这部分内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贡献。

《宣言》指出，“在现阶段，加强反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必须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队伍中坚决克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妨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妨碍在不断变化的具体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这一理论，用引经据典和死啃书本来代替对具体情况的研究，使党脱离群众。”“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共产党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

后来，在中苏论战中，苏方常常指责中方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而中方则批判苏共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在《宣言》中，“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属于思想方法问题，而“修正主义”则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是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

不过，《宣言》中又说，“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它自己判断。”

有鉴于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宣言》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还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问题：“被打倒的资产阶级总是企图复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还很大。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在叙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怎样推翻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时，《宣言》认为，“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是多样化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力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如果能实现，对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对于全民族，都是有利的。”

《宣言》对此进一步阐述说：“在一些资本主义圈家里，以自己的先进部队为首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在工人阵线和人民阵线的基础上，…把大多数的人民团结起来，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从而保证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工人阶级依靠人民的大多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使议会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同时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

件。”《宣言》的这一段论述，基本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和平过波”的思想。

但是，《宣言》紧接着又说：“在剥削阶级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条件下，就必须考虑另外一种可能，即非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一段论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尽管《宣言》谈到了“和平过液”和“非和平过液”两种可能性，但是按照《宣言》的表述，暴力革命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革命道路。“在每一个国家里，哪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莫斯科宣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发展到鼎盛时发表的，是国际共运历史上一份重要的文献。《宣言》基本肯定了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纲领，并在事实上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变为整个国际共运的纲领。

《宣言》也采纳了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意见。但这些意见，就其性质来说，属于对苏共二十大纲领的修改和补充，而不是推翻。

后来历史的实际发展证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当时以及后来都不同意《宣言》中的这些基本内容，但是，从国际共运的组织原则来说，既然《宣言》是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共同制定、一致通过的，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也在《宣言》上签了字、正式表示了同意，就没有理由不遵守《宣言》，或者只遵守《宣言》中自己赞成的那些部分，而不遵守自己不赞成的那些部分。即使中国共产党诚实地认为，《宣言》的基本内容为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单独不服从《宣言》的约束，甚至对《宣言》

中的基本纲领进行公开批判；而只能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做耐心细致地说服工作，争取在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采纳新的路线，才可以合法地（即按照国际共运的组织原则）改变国际共运的路线。

六

分歧的起源

1958年6月，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请求苏联方面向中国提供现代化的海军装备和技术。7月21日，毛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介绍说：由于苏联自然条件的限制，无法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发生战争，苏联和中国的共同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同志希望同中国一起商量一下，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主席听了尤金介绍情况后，大发雷霆，讲了一些比较出格的话。比如，毛主席对尤金说，“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他犯了很大的错误……（米高扬）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

7月31日，赫鲁晓夫飞到北京，努力向毛主席解释、道歉，说尤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在赫鲁晓夫与毛主席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关于“联合舰队”的问题是个“误会”。毛主席亲口说：“我们不会再提这个问题了。”

尽管赫鲁晓夫此次访华，在“联合舰队”以及共同建设长波电台等问题上没有与中方达成谅解。苏联还是决定继续帮助中国的海军建设，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舰艇制造方面的技术，并为中国自主建设长波电台提供技术帮助。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击国民党军驻守的金门、马祖等岛屿。10月6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实际是毛主席撰写的），宣布暂停炮击。10月25日，彭德怀发布《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以后对金门、马祖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即所谓“单打双不打”）。自1959年起，解放军、国民党军除了偶有相互炮击之外，主要是向对方发射宣传弹。1979年1月1日，大陆方面正式宣布停止对金门、马祖等岛屿的炮击。

按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四条的规定：“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台湾问题虽属中国内政，但由于此前美帝和蒋介石当局已经签订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大陆方面炮击金门、马祖，无疑会对国际形势产生重要影响。但在赫鲁晓夫7月底、8月初访华期间，中方并未就即将进行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与苏方协商，也未向苏方通报。

1959年9月15日至27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这次访问在当时有助于缓和苏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防止核大战爆发。不过，在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对西方帝国主义做了一些让步，不再要求美英法驻军在短期内撤离西柏林。

毛主席对于赫鲁晓夫此次访美十分不屑，作诗一首，讽刺赫鲁晓夫讨好美国：

赫鲁晓夫访美

（1959年10月）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犍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

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其中，“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犍半盘银”一句，说的是，赫鲁晓夫在向毛主席通报访美情况时，曾经提及美国许多人家都有汽车，有大房子，有一个农场主送给了他三头良种牛，还有一个资本家送给他一盘古银币。

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据说赫鲁晓夫飞抵北京时，中方为表达对赫鲁晓夫访美的不满，连仪仗队都没有准备）。10月2日，毛主席与赫鲁晓夫会谈。双方在若干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在谈到中印关系问题时，中方对此前不久塔斯社发表的关于朗久事件的声明表示不满；双方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争吵。

1959年，在中印边界东段，一股印军侵入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在一个叫朗久的小村庄设立了哨所。8月下旬，在朗久哨所的印军与中国边防部队发生武装冲突。

9月9日，塔斯社发表声明，声明说：“最近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报纸，围绕不久前在喜马拉雅山地区中印边境发生的事件挑起了一个大肆叫嚣的运动。这个运动显然是为了离间亚洲的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这两个国家的友谊对于保证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和国际合作具有重大的意义。鼓动这个运动的人力图破坏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并阻挠亚洲人民在争取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加强团结。值得注意的有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些集团抓住了这个事件，它们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对在中印边境上发生事件不能不表示遗憾。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同印度共和国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中苏两国人民有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的纽带联系着，这种兄弟友谊是以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伟

大原则为基础的。苏联和印度之间根据和平共处的思想正在顺利地发展着友好合作。想利用中印边境所发生的事件来鼓吹“冷战”和破坏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企图应受到坚决的谴责。苏联领导人表示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不会允许那些不希望国际紧张局势缓和而希望它尖锐化的势力在这个事件中坐得渔利，这些势力竭力阻挠已经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苏联领导人也表示深信，两国政府会本着中印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精神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来解决所产生的误会。

9月13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对尼赫鲁政府）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认为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这就使得印度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感到兴高采烈。

尽管中苏双方的领导人在10月2日的会谈中发生了严重争执，现场气氛很不愉快，但在会谈快要结束时，毛主席仍然表示，双方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意思就是双方的立场、观点在90%的方面一致，不一致的只占10%），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影响双方的团结。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周恩来指出，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偏袒印度。周恩来又一次强调：“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

1960年7月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到，1959年9月9日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说明赫鲁晓夫“反华”已经“表面化”了。

从1959年开始，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在中苏关系恶化及中苏论战的整个过程中，涉及到当时国际政治的许多事件，其中的是非曲折往往十分复杂。如果要将这些事件的所有细节以及是非，都要搞清楚，不仅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且还会因为过于纠缠细节而使得我们忽略中苏论战背后更主要、更基本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当时中、苏两党两国在国际阶级斗争各自所处的不同地位。

按照现在流行的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观点，中、苏由团结走向分裂是民族国家利害冲突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依照资产阶级的庸俗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谓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根本没有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按照这种庸俗的国家关系学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两国相互利用；随着各自国家利益的变化，必然渐行渐远，直至反目成仇，各自寻找新的盟友。

另外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则认为，毛主席个人争当国际共运的领袖，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两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点，都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出发，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作为政治家的个人，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又因为各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运空前强大，既包括了处于世界体系半外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了外围国家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还包括了核心国家工人运动的很大一部分。然而，国际共运的这几个部分在国际阶级斗争中所谋求的利益和努力实行的策略是有很大不同的。

当时，苏联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半外围国家，领导着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阵营，又通过雅尔塔协定与美国划分了势力范围。苏联国内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也已经巩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存世界体系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不愿意以革命手段来砸烂现存的世界体系。再加上当时的苏联领导认为，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快，假以时日，苏联会在经济总量以及人均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方面都超过美国，只要按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有规则“和平竞赛”，社会主义胜过资本主义是早晚的事。又何必冒革命与战争的风险？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巩固，依靠剥削全世界超额剩余价值而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制度正在发展，西欧工人阶级的物质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欧各国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更不存在武装斗争的条件，西欧各国共产党不可避免地要社会民主党化（如果拒绝社会民主党化，就意味着被无产阶级群众抛弃）。所以，西欧各国共产党普遍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进行“修正”，承认“和平过渡”是正当的革命策略。由于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只有苏共纲领承认了“和平过渡”，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和平过渡”才能算是“合法的”。

苏共如果承认了“和平过渡”，那么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西欧各国共产党还能留在国际共运中。如果苏共拒绝承认“和平过渡”，那么不是苏共把这些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开除出国际共运，就是西欧各国共产党自己脱离国际共运、直接变为“左派”社会民主党；这两种情况，都不是苏共愿意看到的。

所以，苏共二十大所宣布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过渡”的纲领，实际上是满足了西欧各国共产党已经提出来的要求。

另一方面，代表了外围国家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长期革命战争的胜利。

社会主义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体系中还没有什么既得利益。广大亚非拉人民仍然饱受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急切地希望加速世界革命的进程，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放手发动人民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世界范围，则随时准备与帝国主义国家打仗，并在战争中打倒帝国主义。

现有的一些资料表明，毛主席在领导社会主义中国期间，始终在考虑为新的世界大战做准备的问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世界战争作为世界革命的契机。比如，1955年1月28日，毛主席在接受芬兰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俄国把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扫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中国把蒋介石和地主推翻了，东欧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也解放了。美国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结果是美国 and 英国及其它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有利于好战分子，而是有利于共产党和世界革命人民。他们要发动战争，那就别怪我们搞革命……他们不搞战争，还可以在地球上多存在一些时候。他们发动战争越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越早。那时候就要建立人民的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也可能设在欧洲一个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如果那时美国好战分子已被扫光的话。”

在1957年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毛主席说：“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1958年8月1日，毛主席在会见赫鲁晓夫时，饶有兴致地与赫鲁晓夫一起分析了美国在全球的兵力部署，认为美国“力量有限，困难甚

多”；在第二天会谈时，毛主席又提到，按照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相隔二十年来算，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13年了，世界和平也许还能维持七年。1964年10月22日，毛主席在一项批示中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

出于反对害怕战争的立场以及战争来得越早、革命也就来得越早的估计，毛主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在所有的重大国际问题上都应采取坚定、不妥协的态度，甚至要采取某种类似于后来美帝国主义所说的“极限施压”的斗争策略，逼迫帝国主义早日发动战争。中、苏两党在这方面的分歧，在后来的古巴危机期间，有特别突出的表现。

外围国家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半外围社会主义国家与核心国家工人阶级之间虽然在各自的阶级利益和革命斗争策略上有分歧，但这些分歧，总的来说，都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世界革命和进步力量范围内的分歧，表现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内的分歧。相互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却有长远的和根本的共同利益。

借用毛主席首先提出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概念，国际共运中这几种力量相互之间的矛盾属于世界范围的人民内部矛盾，它们各自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国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才是敌我矛盾。

总的来说，在1960年至1965年期间，尽管中苏论战剑拔弩张，中、苏双方基本上将两党论战以及两国关系限定在了国际共运内部矛盾的范围，保留了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余地和可能性。

从1966年开始，中国方面首先将苏联方面彻底开除出国际共运和反帝斗争的阵线，进而将两党两国的矛盾上升为世界范围的敌我矛盾。到了七十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在实际上

与美国结成了反苏的统一战线，削弱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帮助世界资本主义渡过了七十年代的危机。可以说，1966年以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国际阶级斗争方面犯有原则性的错误。

七

一九六零年莫斯科会议

1960年，是中苏分歧在国际舞台上公开爆发的第一年。然而，到年底的时候，由于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中苏争论明显地缓和下来，出现了国际共运恢复团结的希望。其间的过程，一波数折，今天回顾起来，仍然令人感慨。

1960年1月8日，赫鲁晓夫致函毛主席，向中方通报，苏联准备单方面宣布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内将武装力量裁减一百二十万人，并邀请中方派代表出席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

2月4日，中国方面派出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为首的代表团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康生在会上发言时表示：“我们希望有关各国就普遍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康生发言后，苏联方面表示不满。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佩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口头声明，在声明中全面抨击了包括人民公社、大跃进在内的中国对内对外政策。

与此同时，中、苏两国都在准备为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4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借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明确批判了苏共二十大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的纲领，但没有点苏共的名。文章认为：“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列宁主义万岁”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中苏两党论战正式开始。

4月22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万人大会，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长篇报告。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报告。这篇报告一方面说，“苏联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作了巨大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积极支持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东西方首脑会议、关于全面裁军、关于禁止核武器等和平倡议。”另一方面，报告又说，“现代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企图阻碍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4月22日傍晚，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体育宫也举行万人集会，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列宁生前战友、芬兰革命

领导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库西宁在会上发表讲话。库西宁指出，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贡献”；

列宁就曾经推行和平共处的主张。“今天为了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重复帝国主义是侵略性的这一旧的真理是不够的”；“决不能教条主义地只看问题的这一面。必须要看到阻止战争的巨大力量的出现。”

1960年5月1日，苏联防空火箭部队在叶卡捷琳堡附近击落了一架侵犯苏联领空的美国U-2型高空侦察飞机，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承认，他是在美国政府知道的情况下驾机进入苏联领空的，并企图用特殊的无线电技术装置和摄影装置来搜集战略情报。随后，在巴黎举行的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上，赫鲁晓夫严厉谴责了美国军用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的挑衅行动；四国首脑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真理报》也发表文章，指出：现在美国侵略者的真面目已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艾森豪威尔像一个忠实的奴仆那样代表着自己的资产阶级，代表着自己的帝国主义掠夺制度。

5月9日，《人民日报》以“对苏联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为题发表社论。1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文章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凶恶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17日，邓小平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邓小平说：赫鲁晓夫同志在巴黎的演说是一次很好和很有说服力的演说，我们从中看出了苏共中央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我们的立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在京的中央委员已经交换了意见，所有这些同志都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演说。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完全对。18日，中国各大报刊全文发表赫鲁晓夫在巴黎的声明。

5月20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320万人参加的声势空前浩大的示威集会，声援苏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周恩来、朱德、林彪等出席大会。邓小平发表讲话：对苏联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挑衅。契尔沃年科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帝国主义更加公开地张牙舞爪的时候，各国人民都应该更加提高警惕，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警觉地注视和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者的阴谋，准备随时给予侵略者以坚决的毁灭性的反击。契尔沃年科在讲话结束时高呼口号：“苏中两国人民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至5月23日止，全国各地参加声援苏联、反对美帝侵略的集会和示威活动的人数累计达到五千三百多万。

就在中国、苏两党两国因美国U-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而出现了一些团结迹象的时候，双方之间刚刚出现的友好气氛就在随后于北京举行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会议上被破坏了。

1960年6月5日至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前，世界工联书记处和执行局召开会议，讨论理事会会议总报告的草案。中国工会代表团认为，这个报告在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总危机等六个问题上的提法存在着重大的原则性错误，中方对这些错误观点持保留意见，但是同意把报告草案提交给理事会讨论。

6月5日，会议开幕。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在发言时谴责美国间谍飞机入侵苏联领空，指出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但同时也强调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

6月5日晚，中共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17个国家工会代表团中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向他

们介绍中共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苏联工会代表团认为，这是中方对他们搞突然袭击，当场退席。

6月8日，中国工会代表刘长胜在理事会大会上发言时，全面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刘长胜指出，那种认为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所谓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就是不可设想的；世界人民必须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不能用天真烂漫的态度去对待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只有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有可能使冷战不至于发展为热战。刘长胜的讲话得到了与会的亚非拉国家工会代表的热烈响应；刘长胜的讲话结束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由于中、苏双方争论激烈，世界工联书记处面临几乎失控的局面，一度提议理事会休会并召开世界工联的紧急代表大会解决分歧。最后，经过双方妥协，这一次世界工联理事会总算是圆满闭幕，并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殖民主义等重要决议。

事后，苏联方面认为，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自行召集当时在北京的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开会，在世界工联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会议上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号召其他党的代表以及非党的工会活动家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当代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将中国领导人与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暴露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国际共产主义的敌人用来破坏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团结。这是中共领导人所采取的一个新的分裂步骤。

从当时国际共运的组织原则来说，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是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同意的，也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签字同意的。所有在这个文件上签字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有义务遵守《宣言》所规定的各项纲领和政

策，包括《宣言》所肯定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内容。即使一个党对这些内容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在兄弟党内部讨论中提出，并留待下一次兄弟党会议来解决，而绝不可在属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中自行公开反对《宣言》所规定的纲领和政策。

此后，在纪念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四十周年之际，苏联国内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左倾幼稚病”和教条主义。6月12日，《真理报》文章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分子的话是错误的和不正确的，他们的看法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政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这段话，显然是在针对中国的“大跃进”运动。6月23日，《共产党人》杂志（原名《布尔什维克》杂志，是苏共中央的理论和政治机关刊物，其作用类似于中共的《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称：“有些政治领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倾向”，从而“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出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教条的和左倾的。”

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召开之前，6月2日，苏共中央曾经向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建议，利用六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当时的名称）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一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国际局势交换意见。

6月10日，中共中央复函苏共中央，提议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扩大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并将会议推迟到十一月份召开，但各国兄弟党的代表可以先在布加勒斯特就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

点初步交换意见。苏共中央同意了中共中央的提议，但在复信中又表示，在布加勒斯特的会谈虽然不会做出任何决定，但也不排除讨论国际问题。

6月17日，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途径莫斯科时，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等人与彭真会谈。在会谈中，苏方指责中国方面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采取了极端危险的措施，违背了国际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6月20日，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第二天，苏共代表团向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份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就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发生的事件对中共提出批评，并全面批判了中共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系列观点。22日，赫鲁晓夫与中共代表团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指出，中共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上展开行动，是违反党性、拉帮结派的派别活动。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希望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但不能接受中共以非同志式的态度对待苏共。

6月2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在会上，中、苏两党短兵相接，除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外，其他兄弟党的代表团都支持苏共的观点。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一个主要反映苏方观点的会议公报，中共代表团也在公报上签了字。但是，两天后，中共代表团又向各兄弟党代表团散发了一份书面声明，第一次点名批评了赫鲁晓夫。在这份书面声明中，中共代表团表示，赫鲁晓夫破坏了会谈前中苏两党达成的协议，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滥用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共在涉及到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一系列问题上同赫鲁晓夫有分歧，中共决不

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国际共运的命运绝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苏关系一度急转直下。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全部召回正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将从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撤离完毕。

1960年7月，苏联突然召回在华苏联专家，当然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一定困难。但我们不能因此抹煞苏联从1950年起给予新中国的长达十年以上的大规模援助的功绩。不仅如此，虽然苏联在此时召回了专家，但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并没有停止（下面还会再做介绍）。

然而，也正是在1960年七、八月间，中、苏关系不仅没有破裂，反而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在这一年夏天的中共中央内部会议上，毛主席将与赫鲁晓夫的斗争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表示，中苏两党两国还是要“团结高于一切”；苏联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所以问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赫鲁晓夫仍是半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问题不超过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困难较大，又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以必须争取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利用中国的困难，伙同蒋介石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也非与苏联改善关系不行；中共的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

从8月1日开始，中国方面开始在各种外交场合畅谈“和平共处”。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两个月前在与苏联工会代表团会谈时，还在说：“关于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言论只能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它排除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可能性”；8月份，刘宁一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时，却表示：

“中国人民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即使对“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也愿意“同它实行和平共处”。

9月17日至22日，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同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五次会谈，为预定于11月份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做准备。10月1日至22日，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展开工作，围绕苏共提出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和告世界人民书草案等文件进行了讨论。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舆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红旗》杂志甚至发表文章，认为靠发动战争来推进革命是根本不可设想的，国际反帝力量应当团结起来，制止或推迟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陈毅在会见英国客人时表示：国际共运只能以苏联党为中心，不能以别的党为中心。外交部给中国各驻外机构发出指示，要求对于赫鲁晓夫所提出的“实现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的错误观点，不要主动评论。国际共运中的绝大多数兄弟党希望中苏团结；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为促进中苏团结，也做了不少工作。

1960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来自81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最后阶段的商谈，终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12月1日，大会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即著名的《莫斯科声明》。

《莫斯科声明》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两种社会制度较量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

义走向崩溃、殖民主义走向灭亡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取得胜利的时代。

《声明》认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社会主义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份额超过资本主义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社会主义将在人类活动的决定性领域（物质生产领域）战胜资本主义。

《声明》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了，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声明》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不是世界大战的结果，而是由于两种社会制度相互之间的竞赛和斗争，由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对社会主义有利的变化，也由于爱好和平的力量成功地进行了争取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这一段分析，直接肯定了苏共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观点。

在谈到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作用时，《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派的主要堡垒和国际宪兵，它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敌人”。这些表述，与中共一直主张的“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的观点相一致。

在说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与建设方面的成就时，《声明》特别提到，苏联正在成功地为全面建设共产主义而努力。这个说法，与苏共二十一大认为苏联已经开始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相一致。

《声明》认为，资本主义要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复辟，从经济上和社会上来说，已经不可能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要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也只能是通过政治的手段，通过资产阶级在国内篡夺政权或者通过帝国主义侵略颠覆）。这一

观点，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显然是错误的，也与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所说的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不一致。这一内容写进了《声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大让步。

《声明》强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当代最迫切的问题。”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没有改变。

但是可以挫败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现实力量已经出现。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必须现在就开始防止新的战争的努力，而不是等到原子弹和氢弹已经开始落在人们头上的时候”。这些叙述，主要反映了苏共的观点。

《声明》肯定了苏联所倡导的全面、普遍裁军的建议。

《声明》指出，殖民主义的完全崩溃已经临近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就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来说，“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这反映了苏共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而不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主要力量的看法。

《声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该进行争取和平、民主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并团结社会民主党中的劳动人民。

《声明》重申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争取用和平方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使议会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的观点。

《声明》谴责了南斯拉夫的国际机会主义，认为南斯拉夫机会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集中表现。这段文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胜利。

《声明》指出，修正主义仍然是国际共运所面临的主要危险。但是，《声明》又指出，“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教条主义和宗

派主义在某一个党的这个或那个发展阶段上也可以成为主要危险”。《声明》的这一段文字为后来苏共批判中共陷入“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提供了一些依据。

此外，《声明》在谈社会主义阵营时不再使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总的来说，《莫斯科声明》基本肯定了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重大让步。在莫斯科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中苏两党领导人举行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争论，使两党两国关系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在《声明》的签字仪式上，赫鲁晓夫激动地与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多次拥抱。

中苏两党两国间重新出现了亲密友好的空气。12月9日，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返回北京，毛主席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人民日报》、《真理报》同时发表社论，赞扬中苏之间“伟大的友谊”。12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拜会毛主席，转达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本人对他67岁生日的祝贺。据契尔沃年科回忆，那一天毛泽东非常感动，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表示在自己生日这一天接受这一崇高的祝贺，对他来说是一大荣幸，并请契尔沃年科转达他对赫鲁晓夫的最热情的感谢。

1961年初，陈毅在做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报告时说，“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要“把亚非国家放在第二位”，“不能厚于亚非而薄于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陈毅说，“我们和苏联穿的是连裆裤，是分不开的，弟兄还是弟兄，应该有这种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感觉。把苏联共产党搞臭了，对我们中国共产党没好处”；“这回中央处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决心很大，情况比较清

楚，方法很好，所以能够达成莫斯科会议声明这样一个协议”；“要当中心是可以的，要人家推举。不能自己封，人家推举我们还要谦让”；“我们要当中心，不能口里面去讲，只能讲兄弟党是平等地位，大家协商一致”；“他反帝我们推他向前，拥护他向前，他来扛大旗，我们来扛二旗，别争。情绪要转过来”。

1961年1月18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应该说，这次莫斯科81国会议开得很好，成绩伟大，基本上把反华的风潮打下去了”；“要同国际兄弟党团结，要同苏联团结，要同81个国家的党团结，不管他们怎样骂过我们，我们还是要团结，等待他们觉悟”。

彭真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对《莫斯科声明》表示肯定：“声明是个好文件，不能一律像我们中央的语言。赫鲁晓夫说自己活着也要让人家活着。看文章不要光看枝节、语气，要看本质，看主流”；“81国的文件，把我们一党的主张变成81国的主张”；“没有两面解释的东西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有的同志对声明上有二十大的字样不满意，二十大如果不要，把苏联搞臭了，有何好处？苏联脸上无光我们脸上也无光，二十大搞掉，不仅苏联会出乱子，而且东欧几个国家也会出乱子。还是不出乱子好。上次也写了二十大，而且字句改了，写了各国党都有贡献”；“现在，我们应按声明办事，不能翘尾巴”。关于1960年底以前的中苏两党争论，彭真讲：“15个月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矛盾”。

1961年，中国方面没有发表涉及两党分歧的文章。

1961年1月，赫鲁晓夫致函中国政府，提出苏联政府愿意将米格-21式歼击机的生产技术转让给中国（这项技术后来成为中国自主生产歼7式战斗机的基础）。其后，中国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商

谈并签订了有关在中国生产这种新型歼击机的技术援助协定和帮助中国生产伊尔14式运输机的协定。

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主席，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渡过困难，后来中国决定向苏联借50万吨蔗糖。4月，中国政府经济、科技代表团与苏方达成协议，

1960年的中方贸易欠款可在五年期间分期归还，不计利息。对此，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部部长表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6月，中苏签订了关于向中国提供10万吨小麦、10万吨面粉和10万吨黑麦的协议。同年，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三亿多卢布。

从1960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允许苏联飞机经过中国领空向老挝万象空运武器、石油和粮食，以援助当时与老挝爱国力量合作的老挝中立派政府，给老挝人民的反帝斗争以有力支援。1961年8月，战后第三次柏林危机爆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封锁了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并构筑了“柏林墙”；

随后，苏联政府宣布恢复进行核武器试验爆炸。中国对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示完全支持。苏联方面认为，中苏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中国方面则表示，中苏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得到妥善解决。

令人遗憾的是，中苏友好团结的光明前景最终没有实现。到了1962年，随着古巴危机的爆发，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不幸事件的影响，中苏关系无可挽回地恶化了。

八

古巴危机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83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应邀出席。

此前，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恶化，苏联于1961年初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召回了在阿尔巴尼亚的苏联专家。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坪击霍查是“民族主义左倾分子”，并且说，总有一天，“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要为他们对自己的图家、自己的人民以及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带来的危害负责”。

苏共二十二大还做出决定，将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

10月19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反对苏共批判霍查。周恩来指出：1957年的《葵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是各图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行动的纲领。宣言和声明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的保证。维护这种伟大的团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不公平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

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10月23日，中共代表团提前回图。周恩来在临行前在列宁墓向斯大林敬献了花圈。

1962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失败的教训。在讲到国际形势时，毛主席说：“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

毛主席继续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这是毛主席在党内第一次明确提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已经“被修正主义篡夺了”。这个讲话的内容，当时没有在一般党员和群众中传达。

由于历史原因，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塔塔儿族（苏联称鞑靼族）、柯尔克孜族（苏联称吉尔吉斯族）的人民分别居住在中、苏边境两侧。还有一些原来居住在苏联的汉族华侨，由于斯大林的错误的民族政策，也迁居到了新疆的伊宁、塔城等地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新疆地区的许多人民同时拥有中国、苏联双重国籍。

1962年3月至5月，共有约七万中国边民通过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和塔城的巴克图口岸前往苏联，越境的边民主要为哈萨克族；导致伊犁草原、阿尔泰草原等边境地区的人口和牲畜锐减，农牧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这就是“伊塔事件”。

其间，还发生了8月29日“伊宁反革命暴乱”。当天，约两千名当地居民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举行抗议活动，呼喊“驱逐汉人”、“打倒中国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并冲击州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协助当地公安部门平息了暴乱。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即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公报概括了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总路线：“国际形势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我国所奉行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条总路线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

会议号召：“团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其他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统一战线。”

会议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我们应当继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所以，到这时为止，中共公开的、正式的对外政策，仍然是团结“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八届十中全会也提出了在国际共运中“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任务：“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坚持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也要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总之，是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

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原来的古巴共产党没有参加古巴革命；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初，卡斯特罗也并无敌视美国，并曾于1959年4月访问美国，受到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热烈欢迎。但是，随着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对美国资本家在古巴所拥有的银行、工厂、商店、农场进行国有化，终于触动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美国政府开始对古巴实行所谓制裁，尤其是停止从古巴进口蔗糖，妄图从经济上扼杀古巴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及时向古巴提供了经济援助，大量进口古巴蔗糖并向古巴提供急需的原油和武器。

1961年1月，美国与古巴断交并对古巴实行全面贸易禁运（这项贸易禁运的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1961年4月15日，由一千多名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雇佣军在古巴猪湾登陆，妄图推翻革命政府；革命政府仅用三天的时间就消灭了在猪湾登陆的雇佣军。

猪湾事件的第二天，4月16日，在哈瓦那群众大会上，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这标志着古巴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此前，1959年，美国在土耳其和意大利部署了45枚朱庇特式中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可以在接到指令的五分钟内完成发射，飞行12分钟后就可以打到莫斯科，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相比之下，当时的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准备时间长达一个小时，发射后，还要用半个小时的时间绕飞半个地球才能到达攻击的目的地。

在古巴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后，苏联方面便开始设想，在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以对美国的威胁来抵消美国对苏联的威胁。1962年5月，苏联制定了在古巴部署60枚配备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的计划并在9月份分两批运抵古巴。

10月15日，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在古巴上空拍摄到了正在安装中的导弹发射架。10月22日，美国军队进入战备状态。10月24日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封锁。

10月26日，为防止美国强行拦截苏联货轮并夺取货轮运载的导弹等先进武器装备，正在前往古巴的苏联货轮开始返航。

10月27日，苏联驻美大使馆向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转交了赫鲁晓夫的信件，提出了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的两个条件：美国须保证不入侵古巴，并从意大利、土耳其撤出美国部署在那里的导弹。

当天，古巴导弹危机也进入了最紧张、最危险的阶段。全世界的命运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

一架从阿拉斯加起飞的U2高空侦察机逼近了苏联楚科奇半岛，苏联空军的战斗机起飞拦截，美国随即派出两架F102式战斗机携带核火箭掩护U2侦察机。与此同时，驻阿拉斯加的BS2战略轰炸机携带实战用的核炸弹升空值班，随时准备轰炸西伯利亚。

一艘携带核鱼雷的苏联潜艇正在古巴附近海域潜水隐蔽。美国海军一艘驱逐舰发现了这艘潜艇，在不知道这艘潜艇载有核鱼

雷的情况下，向其投掷训练用的深水炸弹以迫其上浮。当时苏联潜艇舰长一度认为战争已经爆发，决定发射核鱼雷，但遭到副舰长的反对。最后，这艘苏联潜艇没有发射核鱼雷，而是决定上浮并向莫斯科请示。

同一天，一架飞临古巴上空的美U2高空侦察机被苏联反空部队用萨姆2式导弹击中后坠毁。得知U2被击落的消息后，美国空军立即决定要派出战斗机袭击在古巴的苏联防空导弹基地。好在那个时候，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还不像现在这样腐朽，总统并非完全是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傀儡，当时美国的总统约翰·肯尼迪还算是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在最紧要的关头，肯尼迪否决了空军袭击古巴的计划。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62年的10月27日是自美国首次使用原子弹以来全世界最接近核大战与核毁灭的一天！

与此同时，美国统治集团上层陷入了激烈争吵。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上将为首的好战分子狂妄叫嚣要武力解决，准备于10月29日对古巴发动突然袭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内阁成员（在美国体制中，国防部长属于文职官员）主张谈判解决，但只同意接受赫鲁晓夫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即不入侵古巴）。

肯尼迪在情急之下绕过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不惜私下开展“出类”美帝国主义利益的秘密外交。约翰·肯尼迪派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秘密约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肯尼迪向苏联方面口头承诺，待危机平息后，美国将撤出部署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导弹；但由于美国国内的困难，肯尼迪无法向苏联提供履行此项承诺的书面文件，并且要求苏联方面为此保密。

赫鲁晓夫得知肯尼迪的口头承诺，说服苏共中央政治局接受了这一解决方案。10月28日，莫斯科广播电台向全球广播，鉴于

美国已经保证不入侵古巴，苏联决定从古巴撤出中程弹道导弹。古巴危机结束。

1963年4月，肯尼迪履行了他的承诺，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出了美国部署在那里的中程弹道导弹。

1963年11月，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1968年6月，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有一种观点认为，肯尼迪兄弟先后遇刺身亡都与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对他们与赫鲁晓夫秘密达成协议不满有关。现在正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美国总统的小罗伯特·肯尼迪就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

从今天掌握的资料看，古巴危机的解决是社会主义苏联在“冷战”期间与美帝国主义对峙中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当时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对苏联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下面会进一步解释）迫使美帝国主义做出了重大让步，从可以直接威胁苏联的土耳其、意大利撤出了导弹，并挫败了美帝侵略古巴的计划。

然而，由于赫鲁晓夫恪守其与肯尼迪的承诺，全世界的人们只看到苏联货轮在美帝威胁下返航，苏联以屈辱的方式从古巴撤出导弹（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时接受了美帝的监督），却对美圈的重大让步毫不知情。美国从土耳其、意大利撤出导弹，是在古巴危机结束半年后不声不响地进行的，苏联方面也一直没有张扬。直到1995年，当年与罗伯特·肯尼迪谈判的多勃留宁发表了回忆录，古巴危机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由于缺乏重大的全球性国际斗争的经验，对于核武器时代大圖斗争的复杂性和危险性缺乏足够的估计，仅从一些表面现象出发，中国共产党以及毛主席本人对古巴危机的性质及其解决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

在后来的“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中，中共方面认为，“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同美帝

图主义做政治买卖，一心一意要同肯尼迪结成反动同盟，不惜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苏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屈服于美帝图主义的核讹诈，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

赫鲁晓夫下台后，《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问题上以“冒险主义”开始，以“投降主义”结束：“他一忽儿实行冒险主义，把导弹运到古巴，一忽儿实行投降主义，俯首贴耳地按照美国强盗的命令，从古巴撤走导弹和轰炸机，接受美国舰队的检查，甚至背着古巴政府，企图出卖古巴的国家主权，答应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派人到古巴国内去“视察’。赫鲁晓夫这种作法，使伟大的苏联人民遭受到十月革命四十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如前面所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是为了抵消美帝在意大利、土耳其部署导弹所带来的威胁。

美帝是不可能自愿从意大利、土耳其撤出导弹的，苏联又不可能对土耳其、意大利发动战争；如果不采取类似于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措施、触动美帝的“核心利益”，美帝是不可能解除在苏联附近的导弹威胁的。

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以后，有没有可能坚持不撤出，不惜冒与美国一战的风险呢？这里且不说，用全世界几千万人民的性命做赌注，在核战争的边缘玩“极限施压”的游戏，是否符合共产主义者的道德。仅从纯军事角度分析一下。

古巴就在美国的大门口，距离美国仅两百多公里，英国的海空军占绝对优势。这些因素决定了，如果打常规战争，古巴人民是不可能挫败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到那时，苏联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使用已经部署在古巴的携带了核弹头的导弹，攻击美国的主要城市。如果是那样，就必然演变为美苏两国之间的核大战。

与后来的情况不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苏联在核武装方面相对于美国仍然处于绝对劣势。当时美国拥有约27000枚核弹头（其中战略核弹头3600枚），苏联仅有5000（其中战略核弹头300枚）；

美国拥有约300枚可以打到苏联的洲际导弹，苏联仅拥有50多枚可以打到美国的洲际导弹（其中实际可用的仅20多枚）；美国部署在意大利、土耳其的中程导弹只要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打到莫斯科；美国当时已经有了核动力潜艇，可以在北冰洋、日本海从水下发射中程导弹。所以，如果核大战真地打起来，苏联将面临灭顶之灾，而美国可能只需要牺牲几座城市。

在力量对比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能够迫使美国解除对苏联的中程导弹威胁，这显示了当时苏联领导人的胆识和高超的外交斗争艺术。

古巴危机之后，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急剧地尖锐化了。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看来，苏联在古巴危机中对美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其修正主义面目已经彻底暴露，中共与“苏修”决裂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九

苏共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意见

1962年底、1963年初，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等分别举行了代表大会。这些党的领导人分别在各自的代表大会上对中共进行了公开批评。此外，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在法共中央全会上批评了中共。

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包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在这些文章中，中共反驳了各兄弟党的批评并不点名地批判了以苏共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

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希望停止公开论战、恢复两党团结。苏共中央来信说：“苏共中央认为特别重要的是立即采取具体和现实的步骤，目的在于加强我们之间的团结，旨在改善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气氛。”

“公开的，越来越尖锐的论战只会破坏兄弟党之间的团结，损害我们的共同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出现的争论，阻碍着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削弱了在国际舞台上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努力，对兄弟党的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的活动，那里有着复杂的国内局势。”

“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了解，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达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从我们来讲，从我们的政党来讲，我们的政策的正确性取决于我们是继续走在同一个队伍之中，还是卷入一种艰难且不必要的斗争，后者只能导致相互疏远，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如果我们在两大阵营之间尖锐斗争的形势下，没有勇气和力量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克服现有的分歧，那么未来的一代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苏共中央来信提议，举行一次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晤，为进行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协商会议做准备工作、创造有利的环境。

关于会议的内容，苏共中央来信做了进一步说明：“此次会议关注的中心应该是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计划作斗争的任务，为了各国人民自由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为了加强凝聚力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毛主席读到苏共中央的来信后，很重视。2月23日，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恩来共同在毛主席的卧室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时毛主席患上了感冒，是半坐半卧在床上与契尔沃年科交谈的。

毛主席表示赞成苏共中央关于结束两党论战的想法。但是，毛主席说，苏共和另外42个兄弟党都在谴责中共，然后，引用中国古语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毛主席对契尔沃年科说：你们骂我们，就给了我们“往”的权利，我们就可以骂你们。毛主席动情地表示：“我们不害怕批评。既然论战开始了，那就让它继续下

去。事实上，如果论战开始，天会塌吗？中国西山的草会不长了吗？不！

天不会塌，草木还会生长，女人还会生孩子，鱼还会在水中游。正相反，如果这43个党的行动结果让天塌了，草木不长了，女人不再生孩子了，鱼从水中消失了，那才是奇迹呢！

但毛主席也同意，这种“来”、“往”在某些地方必须要有所限制，争吵后应该“休息”。

毛主席指出，双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理解不同。说到这里，毛主席特别强调，苏共中央的2月21日来信没有提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问题。

毛主席指责苏联单方面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契尔沃年科表示，没有人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毛主席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否可以参加提议中的马列主义政党协商会议；契尔沃年科说，这个问题要由参加会议的各个兄弟党来决定，也就是不置可否。

毛主席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邀请南共盟参加他们各自的党代表大会。契尔沃年科表示，苏共希望通过各兄弟党的努力，对南斯拉夫产生积极影响。毛主席不容置疑地表示：“应该遵循81个党的决定”（这里说的是1960年《莫斯科声明》谴责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有关段落）。契尔沃年科表示，苏共在与南共盟的关系中严格区分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间关系。毛主席认为，南斯拉夫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靠帝国主义的金钱过活，并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比利时共产党没有邀请南共盟参加他们的党代表大会表示赞赏，暗示不赞成南共盟参加提议中的马列主义政党协商会议。

毛主席解释说，中共还将继续发表文章，以答复法共、意共和美共对中共的攻击；此后，中共将暂停发表新的论战文章。

毛主席向契尔沃年科表示：“我们之间不是敌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毛主席说，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争吵就像“家庭中的争论”一样。毛主席继续说，听说赫鲁晓夫同志有访问柬埔寨的计划，希望赫鲁晓夫同志在访问柬埔寨的途中顺便访问中国。对此，契尔沃年科表示，两党最高级别的领导人经常会晤有助于消除中苏之间目前存在的紧张关系。

会谈将要结束时，毛主席提到中国仍然缺少大型精密机床和轧钢机，还主动提到1962年中国实际的粮食产量比西方报刊所报道的要低一些。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全面阐述了苏共中央对国际共运中各个重大问题的看法。

苏共中央3月30日的来信首先解释说，赫鲁晓夫没有在近期访问柬埔寨的计划，将要对柬埔寨进行访问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然后，来信用热情而友好的态度邀请毛主席第三次访问苏联：“我们记得，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的时候说，他只到过苏联两次，并且只访问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他表示希望再次访问苏联，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国家。当时他说，他愿意在我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作一次旅行。对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愿望，我们表示了欢迎。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二日，苏共中央写信给毛泽东同志，邀请他到苏联来休养，并且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

遗憾的是，那时毛泽东同志未能应邀。苏共中央欢迎毛泽东同志来访问。即将来临的春天或夏天——我国一年中的好季节，是进行这种访问的最好时间。我们也愿意在其他任何时候对兄弟党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代表毛泽东同志给以应有的接待。毛泽东

同志在这次到我国访问的时候当然不会是一个人，我们党的领导同志会同他在一起，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机会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同志可以看到苏联人民如何劳动，看到他们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在实现我们党的纲领方面获得了哪些成就。”

然后，来信提议，为了给即将开始的两党会谈和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应该停止公开论战，“不再发表那种不能缓和而只能加深我们分歧的公开声明”。

来信强调，中苏两党之间的会谈只是为所有兄弟党的会议作“初步”准备：“不言而喻，当我们两党讨论涉及所有兄弟党的问题的时候，这种讨论只能具有初步性质。…只有所有兄弟党集体参加，只有在应有的程度上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切队伍的全面经验，才能顺利地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

然后，来信开始谈到涉及中苏两党分歧的实质性问题：“在这封信中，我们也愿意谈谈若干原则性的问题”。苏共中央来信对这些“原则性问题”的阐述，实际上反映了苏共中央对一份新的国际共运纲领性文件的设想。

苏共中央来信认为，由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制定的国际共运的共同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声明通过以后的这段时间里，生活不但没有动摇它的任何一个基本结论，相反完全证实了在总结现代经验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共同制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正确性。”

然后，来信说明了在苏共看来当前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特征：“苏共的出发点是：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

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这段话，基本上照抄了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的有关内容。

来信指出，这个新的历史时代“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

来信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发展壮大，“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帝国主义的重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和平与安全的强大堡垒”。

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进一步加深”。由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帝国主义阵营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掠夺和侵略了：“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及其经济和军事威力的加强，帝国主义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可能性在明显地缩小”。

来信据此得出了苏共中央关于当时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看法，即：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而不是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力量：“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的，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进步力量。”

“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广泛的农民运动，人民群众为了推翻法西斯和其他暴虐制度的斗争，反对民族压迫的一般民主运动，这一切在当代正在汇合成一股冲击和摧毁资本主义的世界的革命的洪流。”

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一观点出发，苏共中央来信进一步阐述了苏共的“和平共处”纲领。

来信指出，“帝国主义的反人民的掠夺本性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掠夺本性，不能放弃用战争来解决国际舞台上的矛盾的企图。”

帝国主义的这种企图是必然要失败的：“只要裁军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应该在其武装力量方面一直保持对帝国主义者的优势。我们将要迫使帝国主义者记住，如果他们发动战争，要用武力去解决人类沿着什么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问题，那么这将是最后一次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将最终地被粉碎。”

来信同时也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严肃对待核武器和核战争的危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根据新的条件制定自己的方针时，也不能不十分认真地考虑这样一个重要因素——进行战争的军事技术手段的根本质变，这种质变是同具有空前破坏力的热核武器的出现和积累相关联的。”

为了避免热核战争毁灭人类，“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所有战士的义务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对社会主义的胜利有利的可能性，不容许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

防止热核战争或新的世界大战，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目前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使得社会主义各国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一起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完全现实的任务——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来信指出，一方面，我们不能无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不能保证帝国主义者不企图发动世界战争。共产党人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

另一方面，不能否认，“战争的军事技术手段的根本质变”也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狂热形成了一定的限制：“侵略者在目前条件下的处境，根本不同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处境，尤其是不同于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处境。从前，战争的结局一般都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战胜了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战败国继续生存下去，过一个时期又恢复了自己的力量，而且甚至能够再一次发动侵略，德国的例子恰好证明了这一点。热核战争不会给任何侵略者提供这种前景，帝国主义者是不能不考虑这种情况的。”在新的条件下，帝国主义“不能去发动世界热核战争而不考虑这会使自己有遭到毁灭的危险。”应当说，苏共关于核战争的毁灭性危险客观上有利于防止世界上主要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的设想，是基本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和世界军事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根据上述分析，来信认为：“帝国主义用以威胁人类的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力量越来越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平力量越来越超过战争力量，这正导致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来信直接引用了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关于“和平共处”的论述：“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是弗·伊·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

这一原则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中，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段话的分量在于，不仅指出了“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列宁最早提出的，而且指出

有中共签字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都承认了这项原则，而且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明确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

来信指出，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并不意味着不准备战争：“苏联大力发展经济，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改进自己的国防，增强军事威力，使武装力量经常处于准备状态。但是，过去和将来我们利用我国越来越增强的威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威胁任何人，不是为了燃起战争的狂热，而是为了巩固和平，为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为了保卫自己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来信指出，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并不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采取调和的态度：“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预计到两个社会体系之间进行毫不松懈的思想、政治和经济斗争；预计到资本主义体系国家的劳动者进行阶级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当人民认为它是必要的时候；预计到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不断发展民族解放运动。”

来信指出，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也不意味着束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为防止世界战争所进行的斗争，丝毫不束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相反，它把极广泛的人民群众联合在共产党人的周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增长了。”

来信指出，从根本上来说，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利，对帝国主义阵营不利：“社会主义各国，利用和平共处的形势，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我们的敌人了解，他们在同我们的竞赛中，是难望获胜的。他们无法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快速度，在社会主义国家

的榜样对于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人民的吸引作用面前，他们是无能为力的。“社会主义激发起了强大的生产力，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这方面就是一个例子。在发展经济方面，苏联已经超过了欧洲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居了世界第二位，而在不久的将来将占居世界第一位。”

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增长竞赛中必然超过并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是简单化的甚至是错误的。由于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规律的限制，特别是受到核心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对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剥削的限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继续存在的前提下，处于外围、半外围的社会主义国家很难在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竞赛中占据上风。未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也不是体现在经济增长方面，而是体现在普遍地、大幅度地缩短劳动时间以及实现世界范围的生态可持续性。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国际共运普遍接受的观点。

来信接下来阐述了苏共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策略的观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是紧密地相互联系的，是相互援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与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共同的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

来信指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夺取政权”、“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目的，每一个共产党在制定斗争策略时，应当考虑“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然而，“每一个国家制定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形式和方法，是各该国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内部事情。”“任何别的兄弟党，无论其人数多少，经验与威信如何，都

不能规定其他国家革命斗争的策略、形式和方法。“这里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含蓄地批评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武装斗争经验以及自己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理解强行要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按照中共所认为“正确”的方式革命。

来信指出，胜利的革命必须正确处理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相互之间的关系，既要反对压制群众革命热情的右倾保守，也要反对不顾客观条件、盲目牺牲的左倾冒险：“革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事业。准确地分析具体形势，正确地估计力量对比，是革命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当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不能制止革命群众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热潮。如果去制止，就等于死亡。但是，不能人为地去推动革命，如果条件还没有成熟的话。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教导说：

没有成熟的起义注定要失败。共产党人号召劳动人民高举红旗，是为了在争取世界上最好的生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不是为了死去，即便是英雄地死去。革命战斗中所必需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不是为了它们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取得伟大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这一段话，堪称精彩，即使对今天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仍然有教育和借鉴的意义。

来信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应当采取的斗争策略。来信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已经进一步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帝国主义在国内的社会基础进一步缩小，使政权集中在一小撮最大的垄断资本家手里。”这就使得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劳动知识分子以及争取和平和民主的各种运动可以结成“统一的反对垄断组织的洪流”。

来信进一步阐述了战争与革命的关系，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来信批判了那种“把社会

主义革命的胜利同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的观点，认为如果那样做，“不仅不能赢得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同情，而且会使他们同社会主义疏远。在存在着具有可怕的毁灭性后果的进行战争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这类号召只能有利于我们的敌人。”

关于是通过暴力还是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问题，来信认为，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应当“争取”以和平方法夺取政权：“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取以和平方法，不通过内战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符合本国全民族的利益。”但是，来信也指出：“革命发展途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要对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阶级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来信关于用暴力还是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表述，与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的有关表述是完全一致的。

来信强调，无论用什么方式夺取政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可能的。”

来信继续阐述苏共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我们党把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世界的革命过程的组成部分，是破坏着帝国主义阵线的强大力量。”

来信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已经进入了消灭殖民制度的最后阶段；在已经获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民族复兴的迫切任务”是团结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爱国力量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进行坚决斗争。

新独立国家是在“两种世界社会体系竞赛的条件下”发展的，其中的大多数仍然没有摆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受到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剥削。

来信认为，在新独立国家，占首要地位的斗争是“它们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彻底的民族复兴、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来信认为，“不发达国家”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是打击和摧毁帝国主义体系的最有效的办法，能给国际无产阶级以最大的帮助：“不发达国家取得完全独立，就会使帝国主义受到新的严重的削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粉碎当前的掠夺式的和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的整个体系，必然会破坏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对“世界农村”进行经济剥削的基础。不发达国家的、依靠社会主义体系有效援助的、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发展，将给帝国主义以新的沉重打击。”

来信认为，“在争取和巩固独立的斗争中，必须全力团结所有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力量。”在团结所有反帝力量的同时，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做斗争：“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由于力图巩固自己在取得独立以后的统治地位，会在一定时期内建立反动的政权迫害共产党人及其他民主人士。但是，因为这种政权阻碍进步，阻碍解决迫切的民族任务——首先是阻碍取得经济独立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它是长久不了的。正因为这样，尽管受到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这种政权将为人民群众的斗争所扫除。”

来信指出，“苏共把同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的人民以及同半殖民地人民的兄弟同盟，看作是自己国际政策的基石之一。我们党认为，帮助所有沿着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道路前进的人民，帮助所有为完全消灭殖民主义体系而斗争的人民，是自己的国际义务。”

“当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的时候，苏联人民向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援。当也门人民起来反对本国的

奴隶制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向他们伸出了援助的手。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为解放西伊里安、反对依靠美帝国主义者的荷兰帝国主义者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给予了全面的援助。”

来信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国人民，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三大革命力量；三大革命力量相互联系、统一行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来信认为，“最近几年世界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正确性”。就是说，在苏共中央看来，由1957年《莫斯科宣言》、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制定的国际共运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苏共认为，彻底地和坚定地贯彻这条路线是自己的义务。……没有任何理由来修改这条路线。”

苏共中央来信在阐述了苏共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观点以后，进一步说明了苏共对促进国际共运团结问题的看法。

关于国际共运中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来信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完全的平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而且也只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党的为首地位或者任何一种领导权的表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除了坏处以外，决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所有共产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它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对它的胜利和挫折都负有责任，它们都应该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段话的潜台词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这不仅适用于苏共与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中共与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不要一方面打着“以苏联为首”的旗号，另一方面又不允许苏共或其他兄弟党对中共提出批评。

来信继续说：“我们愿意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平等不仅在于有参加集体制订共同路线的同等权利，而且也在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对整个大家庭的命运担负同等责任。”就是说，既然中共参与制定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那么就有遵守《宣言》和《声明》的义务，也有维护整个国际共运共同利益的责任。

关于不同的兄弟党之间、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来信认为，应当“从原则性的立场出发，在使我们的共同事业付出最少的代价的条件下，解决已产生的分歧。”“共产党人有责任培养人民不仅爱自己的国家，而且爱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爱一切人民，有责任教育生活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对全世界劳动者所负的兄弟义务。不这样做，就是不履行共产党人的首要训条，这个训条要求团结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要求像保护眼珠一样来保护我们的团结。”

来信不点名地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在参与亚非国家反帝工作时排斥苏联和东欧兄弟党的做法：“思想上和策略上的分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利用来作为煽起民族主义情绪和偏见、煽起各社会主义人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纠纷的源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战斗号召，意味着这种联合的基础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的团结，而不是民族的区分、肤色或地理原则。仅仅根据属于这个洲或那个洲——无论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或欧洲的原则，来团结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这会给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带来损害。这将不是联合，而事实上是拆散反帝统一战线力量。”

1964年2月，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曾经透露：“中共领导不仅进行诽谤。他们在国家方面以及在各种国际

民主组织里采取的行动，都不是把精力集中在加强反帝力量的团结上面，而是集中在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上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莫希的亚非团结会议上就是这样搞的。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在同我们的代表们交谈时说：

东欧国家不应该干涉亚洲和非洲的事务……我们遗憾的是你们终于来到这里了，这里要你们来干吗，这是对亚非国家团结运动的侮辱……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们将反对你们。’中国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向亚非国家代表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俄罗斯、捷克人、波兰人是白种人，因而‘不能指望他们’，他们总是同美国人——白种人勾结，亚非人民有特殊的利益，应该建立自己独特的联合组织。”（这里说的“在莫希的亚非团结会议”，即1963年2月在坦噶尼喀的莫希举行的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坦噶尼喀后来与桑给巴尔合并为坦桑尼亚；关于苏方指责中共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犯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错误的问题，目前仅有苏方资料，是否可信，请网友自行鉴别。）

苏共中央来信表示，苏共将继续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作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也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来信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也可以成为主要危险，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现在已经“不小于修正主义”。

来信列举了苏中两党会谈应当讨论的五个最迫切的问题：为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而斗争，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

来信解释了苏共在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然后，来信重复了苏共中央2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的呼吁：“现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时刻。今后我们是在同一行列中一起前进，还是让自己卷入对两国工人阶级和我们人民、对所有劳动者都有害的斗争——这种斗争只能导致彼此疏远，削弱社会主义力量，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党，取决于我们的政策是否正确。”

来信指出：“苏共和中共作为强大的党，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的损失会少一些，但是对其他兄弟党，特别是对在复杂情况下工作的兄弟党来说，将会造成很大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困难。”这里所说的“在复杂情况下工作的兄弟党”，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来信向中共提出严肃的问题：“一切都取决于在这种严重而复杂的情况下如何行事。是走上进一步论战的道路，受激动情绪的摆布，把争论变为互骂和对兄弟党的无根据的指责和攻击，抑或是意识到自己对我们伟大事业的命运所负的崇高责任，把事态的发展引向另一个轨道，即有勇气超乎那些今天使我们分离的东西之上，停止非同志式的论战，并集中努力来寻求巩固苏中战斗合作、巩固所有兄弟党的友谊的途径。”

来信呼吁中共，“使陷于新一轮争论的危险过程停止下来”，不要“叫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感到高兴”，“无论什么样的分歧，无论对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的行为怎样不满，都不能为采取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斗争手段作辩护。”“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

苏共中央于1963年3月30日致中共中央的信，是当时的苏共领导人为了挽救国际共运团结而做出的重大努力。

这封来信阐述了苏共中央在当时对世界主要矛盾、战争与和平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共运团结问题的主要看法。实事求是地说，苏共中央在这封来信中所表达的看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超越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1960年《莫斯科声明》对有关问题的论述，符合当时公认的国际共运总路线。中共后来指责苏共违反了《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是不公正的。

即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尽管这封来信中的有些观点已经过时或者错误（比如指望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和平竞赛”在经济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但来信中的大部分观点还是经得住时间考验，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在这封来信中，苏共中央表达了真诚的与中共恢复团结的愿望，言辞恳切，态度真挚；在有些地方，可以说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通篇来信，体现了相当的政治和理论水平。

苏共中央实际上也提出了解决中苏分歧的方案，那就是：基本承认中共自己签过字的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所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在某些个别问题上或一些问题的具体表述上，可以参考中共意见进行修改。希望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其主要方面，能够与国际共运总路线保持一致；即使不能，也不要再搞公开论战，不要公开抨击苏共的“和平共处”政策以及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和平过渡”策略。

十

中共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

中共中央在收到苏共中央于1963年3月30日的来信以后，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于6月14日给苏共中央复信。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于当天全文公开发表了这封复信，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在这封复信中，中共中央全面阐述了自己对国际共运若干重大问题的看法并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苏共。

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篇幅宏大，正文共有共二十五个部分。

复信一开始，也表示了一下谋求团结的态度：“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大原则性的分歧。但是，不管这种分歧多么严重，我们都应当有充分的耐心，寻求消除分歧的途径，以便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加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对于苏联发出的希望毛主席访问苏联的邀请，复信的答复很冷淡：“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邀请毛泽东同志访问苏联。毛泽东同志早在二月二十三日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谈过他现在不准备访问苏联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你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这里说的，毛主席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契

尔沃年科的谈话中已经明确表示不准备访问苏联，与苏联驻华大使馆的记录不符。

接下来，在复信正文的第一部分，中共承认，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

但是，接下来，复信马上说：“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零年声明，确实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心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归根到底，这也就是承认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的问题，承认不承认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要进行革命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们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关于复信在这里说的，“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我们以后在讨论“九评”中的第九评时再详细评论。这里，还是着重讨论中、苏两党在世界革命纲领上的分歧。

复信然后进一步强调说：“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零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复信说，要坚决捍卫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的“革命原则”。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到底承认不承认整个的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整个的1960年《莫斯科声明》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还是只承认其中中共认为属于“革命原则”的部分？

如果中共拒绝承认整个的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整个的1960年《莫斯科声明》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那么中共是不是违反了国际共运的组织原则，是不是出尔反尔，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如果国际共运中的任何一个兄弟党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或需要，从《宣言》和《声明》中任意选取几部分，并宣布自己选取的几部分是属于“革命原则”的部分，而其他部分都是不革命的部分，那么国际共运还有“共同纲领”吗？

复信正文第二部分继续说：“什么是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这一段话，从字面意思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正文第三部分又说：“如果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零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那就是抛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

这一段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苏共中央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在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中，没有用几句话或一段话明确概括苏共所认为的国际共运总路线。

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下苏共关于当前世界历史时代基本特征的概括：“苏共的出发点是：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

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这也是1960年《莫斯科声明》对时代基本特征的概括）

苏共中央来信中还有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广泛的农民运动，人民群众为了推翻法西斯和其他暴虐制度的斗争，反对民族压迫的一般民主运动，这一切在当代正在汇合成一股冲击和摧毁资本主义的世界的革命的洪流。”

如果我们把苏共关于当前世界历史时代基本特征的两段话与中共所概括的国际共运总路线相比较，有任何原则性的区别吗？

在研究中苏论战的文献时，一个重大的困难是，在很多时候，双方对很多重大问题的表述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有差别，也就是强调重点的差别或者先后次序的差别。然而，其中的一方偏要吹毛求疵，上纲上线，将某些次要的甚至是细微的差别夸大为重大的、原则性的差别，有时甚至是故意曲解另一方的本意，为自己攻击对方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寻找依据。像这样的大量无谓争论往往掩盖了双方真实的分歧和矛盾。

比如，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中共中央的复信说：“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

而苏共中央的来信说：“目前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使得社会主义各国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一起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完全现实的任务——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帝国主义用以威胁人类的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力量越来越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平力量越来越超过战争力量，这正导致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关于裁军问题，中共中央的复信说：“提出普遍裁军的主张，是必要的。经过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迫使帝国主义接受某种我军协议，是可能的。如果把全面彻底裁军当做争取世界和平的最根本道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蓄意欺骗世界人民，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

而苏共中央的来信说：“帝国主义的反人民的掠夺本性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掠夺本性，不能放弃用战争来解决国际舞台上的矛盾的企图。”“只要裁军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应该在其武装力量方面一直保持对帝国主义者的优势。我们将要迫使帝国主义者记住，如果他们发动战争，要用武力去解决人类沿着什么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问题，那么这将是最后一次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将最终地被粉碎。”

关于“和平共处”政策，中共中央的复信说：“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然后，中共中央的复信马上指责说：“有些人忽然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算成是自己的‘伟大发现’，自认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有垄断权。”

而在苏共中央来信中，在谈到“和平共处”政策的发展时引用了1960年《莫斯科声明》中的有关论述：“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是弗·伊·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一原则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中，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中方复信中的指责不仅曲解了苏方的观点，而且直接违背了《莫斯科声明》。

中共中央复信说：“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行等方面存在着斗争，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全面合作”。”

而苏共中央来信说：“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调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预计到两个社会体系之间进行毫不松懈的思想、政治和经济斗争；预计到资本主义体系国家的劳动者进行阶级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当人民认为它是必要的时候；预计到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不断发展民族解放运动。”

中共中央复信说：“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必要的妥协，并不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也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妥协。在任何时候，谁都不能拿和平共处的名义，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

而苏共中央来信说：“为防止世界战争所进行的斗争，丝毫不束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相反，它把极广泛的人民群众联合在共产党人的周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

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增长了。”

中共中央复信正文第十六部分说：“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局限于和平共处，那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然而，1957年《莫斯科宣言》曾经明确指出：“根据当前条件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关于两种制度和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各国共产党认为争取和平的斗争是自己的首要任务。”1960年《莫斯科声明》也有类似的表述。也就是说，《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既肯定了“和平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有关决议，而这两个文件上都有中共自己的签字。

中共中央复信说：“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我们看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即：

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言外之意是，如果将“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总路线，就必然意味着不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关系、不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而苏共中央来信说：“苏共把同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的人民以及同半殖民地人民的兄弟同盟，看作是自己国际政策的基石之

一。我们党认为，帮助所有沿着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道路前进的人民，帮助所有为完全消灭殖民主义体系而斗争的人民，是自己的国际义务。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支持各图人民争取本身自由的神圣战争，对民族解放运动给以道义、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大力支持。”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中共中央复信说：“在帝国主义图案中，在资本主义图家中，要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而苏共中央来信说：“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液，不管通过何种形式来实现，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可能的。”

关于“和平过液”的可能性，中共中央的复信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并且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去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在应当利用和可能利用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形式的时候拒绝利用，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变成为议会迷和合法主义者，把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就必然导致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作充分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或者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突然袭击和武力进攻的时候，给予有力的回击。”

而苏共中央来信说：“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取以和平方法，不通过内战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符合本国全民族的利益。”“革命发展途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

剥削阶级要对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阶级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

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人民的反帝斗争，中共中央的复信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而苏共中央来信说：“在摆脱了殖民压迫的国象里，民族复兴的迫切任务，只有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进行坚决斗争的条件下，把本民族的一切爱国力量——工人阶级、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知识分子联合成民族统一战线，才能顺利实现。”

中共中央复信说：“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巩固政治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艰巨任务。对这些国家来说，警惕和反对老殖民主义者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来保持它们的利益，特别是警惕和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苏共中央来信说：“当年轻的主权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以后，占首要地位的已经是它们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彻底的民族复兴、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了。”

中共中央复信说：“有些新独立国家的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措施。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充分估计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巩固同他们的团结。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

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

而苏共中央来信说：“在争取和巩固独立的斗争中，必须全力团结所有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由于力图巩固自己在取得独立以后的统治地位，会在一定时期内建立反动的政权迫害共产党人及其他民主人士。但是，因为这种政权阻碍进步，阻碍解决迫切的民族任务——首先是阻碍取得经济独立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它是长久不了的。正因为这样，尽管受到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这种政权将为人民群众的斗争所扫除。”

所以，在战争与和平、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以及亚非拉地区人民反帝斗争的任务等重大问题上，中共与苏共的看法，在文字表现形式上都是一致或者接近的，并没有原则的分歧。

那么，中、苏两党之间到底有没有重大的原则性分歧呢？有的。

十一

世界革命的中心

在上一篇文章中，比较了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中央中央的信和6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各自对战争与和平、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以及亚非拉地区人民反帝斗争的看法，双方在文字表现形式上并没有大的、原则性的差别。尽管如此，中共在以后的论战中仍然指责苏共在这些问题上都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原则、犯了机会主义错误。

在3月30日苏共中央来信以及6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中，双方各自表达了自己对于当前世界主要矛盾以及世界革命的中心或决定性力量的看法。在这些问题上，双方发生了尖锐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来信中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苏共中央来信又说：“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的，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进步力量。”苏共中央的这些观点符合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精神。《莫斯科声明》明确讲：“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在中共中央的复信中，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一观点，没有正面反驳，而是

说，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能够做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那么，“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那么，在当时的中共看来，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中共中央的复信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这些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中共中央的这一段回答很蹊跷。熟悉毛主席哲学思想和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理论路线的同志都知道，在对事物的矛盾进行分析时，中共以及毛主席本人一向主张：“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主席，《矛盾论》，1937年8月）

中共中央的复信列举了当前世界的四种“基本矛盾”，却没有明确回答，这四种矛盾中，到底哪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哪一种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而其它几种则“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

按照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的分析，这就是犯了“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的错误，“万干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至于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苏共中央来信并没有说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人家的来信明确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中共中央不可能对“主要矛盾”与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只是”一种矛盾之间的区别不清楚。

中共中央的复信在分析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时，怎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违反唯物辩证法的错误呢？

毛主席和中共心目中世界上的主要矛盾到底是哪一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中共中央复信正文的第八部分。

复信正文的第八部分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苏共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中共认为，亚非拉的广大地区，才是“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

应当说，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有正确的一面。我们知道，国际资产阶级统治最不稳定的地区确实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二十世纪的革命主要发生在外围和半外围地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爆发。目前，正在形成一个由俄罗斯领导的世界上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反帝联盟，在打倒美帝国主义对世界统治的过程中发挥着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从当时国际共运普遍接受的理论来说，当时的中共与苏共都同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可以按照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快得多的速度增长，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总量很快就可以超过帝国主义阵营。所以，中共反对苏共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决定性力量”的理论依据是不充分的。

从政治上说，无论是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还是认为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都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只是侧重点和策略不同，都是国际共运内部的矛盾，不是论战中的任何一方与国际共运大多数决裂的理由。

然而，中共中央的复信很快就把上述带有正确性的观点推到极端，使其走向自身的反面。在论述了亚非拉广大地区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以后，复信马上说：“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有人竟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那在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使自己堕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我们知道，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列宁就表达过“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世界的“东方”，取决于包括“俄国、印度、中国”

在内的“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的思想（见这组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但是，说“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都要以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为转移”就是把列宁的正确的思想推到了错误的极端。早在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时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内正确力量就坚决反对和抵制过那种认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都要以苏联社会主义的利益“为转移”的错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使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确实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也不能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的劳动人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劳动人民都将自己的斗争无条件地服从于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甚至说任何人只要“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那在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里且不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事实上“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就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由于客观存在的原因，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中不可避免地大量存在着“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的人。难道这些劳动群众都是亚非拉劳动人民的敌人（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争取对象）？

相比之下，苏共中央来信是这样论述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之间的关系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是紧密地相互联系的，是相互援助的。

社会发展的进程使得革命斗争，无论它在什么国家进行，都是针对着共同的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的革命过程的组成部分，是破坏着帝国主义阵线的强大力量。”

两相比较，哪一种论述在政治上更加正确、更有利于团结全世界反帝力量，是不言而喻的。

在3月30日的苏共中央来信中，对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上一些不利于国际反帝力量团结的不正确言论做了委婉的批评：“思想上和策略上的分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利用来作为煽起民族主义情绪和偏见、煽起各社会主义人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纠纷的源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战斗号召，意味着这种联合的基础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的团结，而不是民族的区分、肤色或地理原则。仅仅根据属于这个洲或那个洲——无论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或欧洲的原则，来团结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这会给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带来损害。这将不是联合，而事实上是拆散反帝统一战线的力量。”

在苏共对中共的这一段批评中，特别提到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组成不应该按照“民族的区分、肤色或地理原则”。据苏方资料，在1963年2月于坦噶尼喀莫希举行的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散布所谓“东欧国家不应该干涉亚洲和非洲的事务”，俄罗斯人、捷克人、波兰人都是白种人，靠不住，白种人必然与白种人（美国人）相勾结的错误观点。

我们无法证实苏方资料中所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或准确。但是，在中共中央的复信中，对于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加以澄清，反而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错误观点，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反咬一口：“现在有人竟然否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国际意义，而借口什么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力图抹煞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的界限，力图压制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要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为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维持统治和

推行新老殖民主义政策制造新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是真正要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而是要维持所谓优等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统治。”

在上面这段话中，中共指责苏共，认为苏共反对用民族、肤色或地理界限来拆散反帝统一战线就是“要维持所谓‘优等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统治”。这种推论，不仅是毫无根据的，而且可以说到了恶意诽谤的地步！也是对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都提供了巨大援助的苏联人民的侮辱和诋毁！

至于复信中提到的所谓“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界限，就不能不让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压迫民族”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压迫民族”的一部分吗？

熟悉红色中国网的同志们知道，我们一贯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从外围、半外围国家搜取了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并将其中的一部分用来维持本国的阶级妥协。但是，对外围、半外围地区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的是国际资产阶级，不是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后者只是在客观上分享了世界范围超额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将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视为不仅是分享了超额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且是作为压迫亚非拉广大地区人民的“压迫民族”的一部分，就完全混淆了世界范围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犯了敌我不分、认友为敌、亲者痛仇者快的原则性错误！

在中共中央复信正文的第二十三部分中，中共对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提出了十分严重的指控：

“美帝国主义及其北大西洋集团的同伙，用了几十亿美元豢养铁托集团。铁托集团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社会主

义国家”的旗号，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现在来看，这些指控，是站不住脚的。

复信正文的第二十二部分提到了阿尔巴尼亚问题：“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分歧的情况下，强调严格遵循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是特别重要的。……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苏阿两党、两国关系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是要不要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具有原则性的意义。”“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要知道，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来信与6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不是两党之间普通的信件往来，而是为当时将要进行的两党会谈交换意见，也可以说是谈判。这种谈判，将要决定为了解决国际共运中一切重大的悬而未决问题的兄弟党国际会议要不要召开、如何召开、围绕什么原则召开。

这里，中共中央复信提出，苏阿关系问题是关系到“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原则性”的问题，并要求苏方为了解决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实际上把苏联对阿尔巴尼亚道歉、承认错误以及苏阿关系在此基础上的缓和当成了中共赞成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赞成恢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先决条件！

中共中央复信还说：“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一回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

正主义集团，这是另一回事。绝不能把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提并论。”这就是说，即使苏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让步，中共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也绝不让步。苏共必须既向霍查集团赔礼道歉，又像中共一样宣布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从根本上关闭了中苏关系缓和、中苏两党团结的大门！

我们现在知道，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根本不是什么真正得到阿尔巴尼亚无产阶级衷心拥护的马列主义政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远隔万里，中国同志对阿尔巴尼亚的实际情况、对阿尔巴尼亚党内复杂斗争的真相一概不了解，中共仅仅是根据霍查集团一些公开的言论，因为霍查集团在中苏论战中表态支持中共，就置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利益于不顾，要挟苏共以及当时世界上大多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向霍查集团屈服！

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

这样，即使计划中的中苏两党会谈尚未开始（这次会谈后来在1963年7月进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两个伟大的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

对于这种破裂，毛主席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负有主要责任。

十二

专政是一个阶级概念

1963年7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就国际共运中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会谈没有达成共识。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向苏联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说明中苏两党的严重分歧，这就是著名的“苏共中央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从苏方观点出发，介绍了中苏两党分歧的发展过程。然后，公开信在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上批判了中共的观点，并概括了苏共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路线。

值得注意的是，公开信针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对苏共纲领的批判提出了反驳。

在196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所通过的苏共纲领，认为苏联正在全面建设共产主义，苏联共产党已经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展为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为全体人民的党；相应地，苏维埃国家也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为全体人民的国家。

在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中共方面指出：“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

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在这个过渡时期中，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那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有什么“全民国家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既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既然那里还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既然那里还有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等等，那怎么能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呢？那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没有必要了呢？”

对于中共的指责，苏共中央公开信反驳说：“中共中央的信件中所包含的论断是完全无力的和脱离苏联人民的生活的。他们教导我们说，在苏联的社会中还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因此也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是些什么阶级呢？从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可以了解，这是“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有人说，中国同志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有着奇特概念。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寄生分子被认为是阶级呢？……是懒汉阶级还是流氓阶级，是盗窃国库者阶级还是寄生虫阶级呢？罪犯在任何社会中也不构成一定的阶级。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当然，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这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

“现在苏联的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同时苏联社会没有一个阶级占有可以剥削其他阶级的地位。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专政是一个阶级概念；中国同志

建议在苏联对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对集体农民还是对人民知识分子？”

“中国同志引用卡尔·马克思的话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在碰到这一点时是指共产主义这个完整的、统一的社会经济形态（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过渡到这一形态的。弗·伊·列宁也发表过一系列的意见，其中十分清楚地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恰恰是为了用来战胜剥削阶级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保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胜利的。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当社会上只剩下劳动者、友好的和本性已经完全改变的阶级，而再也没有人要受镇压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就会消失。”

“中国同志反对在我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以及在苏共纲领中那样有力地宣布的苏共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路线。在他们全篇冗长的信中甚至找不到一处提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及共产主义建设条件下发扬民主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

中共与苏共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全民国家”这个概念的辩论体现了双方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分歧。即马克思、列宁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到底是指哪个历史时期。

中共的观点是，这个“过渡时期”包括了从资本主义灭亡开始到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结束之前的整个的历史时期，可能长达一百年至几百年。苏共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仅仅指的是从资本主义灭亡开始到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已经确立）之间的一个相对短

暂的时期。应当说，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在《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都仅仅是指出，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中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都没有明确说明过他们所设想的那个“过渡时期”到底包括不包括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但是，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提出的反问确实击中了中共中央复信中的一个严重的理论缺陷，也是后来由此发展出来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致命的理论缺陷。当时的苏共和中共都同意，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作为阶级的旧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既然作为阶级的旧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那么，说无产阶级专政还要继续存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到底是对谁专政呢？

正如苏共中央公开信所说，“专政是一个阶级概念”，既然有专政的阶级，就必然要有被专政的阶级，而不能仅仅是一些“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那么，被专政的阶级可以是“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或者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吗？这些“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在当时的苏联和中国既不掌握生产资料也不掌握政治权力，甚至处于边缘和被歧视的地位。所以苏共中央公开信问，为了对付这样的残余，为什么不可以依靠包括了全体劳动者的“全民国家”？

那么，被专政的阶级会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无论在苏联和中国，在当时都不存在大量的、公开存在的以雇佣劳动方式剥削劳动者并以获取剩余价值（利润）为目的的工农业和商业企业，因而也就没有资本家，或者至少没有大量的、公开存在的资本家？那么，谁是“新的资产阶级”呢？

后来，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中，曾经指出：“苏联党、

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说苏联存在着“特权阶层”，另一方面又说这个“特权阶层”就是资产阶级，这就把仍然受到“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制约和束缚的官僚特权集团与不再受这种契约束缚而可以公开追求私人财富积累的资本家混淆起来了。这种混淆，给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极大的混乱，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国的马列主义左派队伍中造成许多消极的影响。

按照中共“继续革命派”的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继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镇压“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然而，如果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就在“党内”，而且还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要求这个“当权派”自己对自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自己镇压自己，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部分仍然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事实上当然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仅仅是共产党内的“一小撮”，说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继续存在，是为了镇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仍然说不通。将一些已经混进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去，属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为了维持自身属性和自身机体的正常行为，但不能解释这个党、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存在？

正如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绝不是为了清除资产阶级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而是为了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也不是为了清除“走资派”，而恰恰是为了维护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并镇压劳动人民对这种统治的反抗。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由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仅是官僚特权集团的国家，而且还是充分发动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

物，在其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也还承担着为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维护劳动群众在这个契约范围内的社会和经济权利的职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限制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即“知识分子”）的物质特权，并在一定程度上，镇压了由残存的小生产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以及小资产阶级右派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但无论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还是小资产阶级右派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都不是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原因。

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2月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连续发表了七篇文章，评论1963年7月14日的苏共中央公开信。这七篇文章，就是“九评”中的前七篇。在这七篇文章中，中共指责苏共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但仍然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将与苏共的分歧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并且“真诚地向苏共领导呼吁，希望你们能够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964年3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明确提出苏联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指出当时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这是毛主席和中共的“继续革命派”对国际共运的一个贡献。但是，必须指出，在国际共运中，毛主席并不是第一个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着“特权阶层”或类似集团的人。即使不算南共叛徒吉拉斯曾经提出过的“新阶级”，早在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就系统阐述过无产阶级革命后工人国家被官僚集团篡夺从而蜕变为“退化的工人国家”。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虽然指出苏联出现了“特权阶层”，但并不认为社会主义中国自己也有一个“特权阶层”。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认为“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如上所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这些观点（后来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部分）混淆了“特权阶层”和资产阶级，也混淆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抨击的当时苏联社会的各种现象，包括文章中所列举的苏联已经在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各种证据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在不能程度上存在着；如果真的逐条去比对，人们同样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变修”，也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淆，是导致中共后来将中苏冲突从世界范围的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的理论依据之一，给世界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由此引起的思想混乱，贻害几十年，至今仍然妨碍着中国的许多马列主义青年正确地总结社会主

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如果不中国的马列主义队伍中克服这一思想缺点，还必将给未来的革命事业带来新的损失。

怎样才能防止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又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呢？“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然后，“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概括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应该采取的十五条措施：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

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可以看出来，“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所提出来的十五条“措施”，绝大部分不过是代表了“继续革命派”的良好愿望，有一些甚至可以说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十五条“措施”中真正可以尝试着具体落实的，只有第十条（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以及第十一条（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如我们在其他地方论述过的，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从而必然出现社会中的一少部分人从直接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并专门从事国家管理和科学艺术工作的现象；不仅如此，这一少部分人必然要利用他们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并将一部分剥削所得用于个人享乐。在不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前提下，在官僚特权集团继续存在的条件下，任何所谓“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或者人为缩小工资差别的努力，最后必然都沦为形式主义，并被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所征服。邓小平下放到江西，去车间里劳动了三年多，除了让他的反革命经验更加丰富，反革命意志更加坚决以外，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接着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然后提出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标准的五个“必须”和一个“应当”“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

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与前面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措施”一样，“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所列举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标准的五个“必须”和一个“应当”，充满了“继续革命派”的良好愿望，却没有一条说明，符合这五个“必须”和一个“应当”的“千百万接班人”如何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具体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中、具体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

其结果，就是毛主席亲自考察、亲自识别、亲自挑选、亲自培养的接班人最终亲手葬送了毛主席的革命事业。

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只能由现实存在的千百万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来创造，而不是由想象中的、“完美无缺”的“接班人”来“接班”。那样的“接班人”不是无产

阶级革命事业的战士，而是中世纪神学所传说的在针尖上跳舞的“天使”，是人世间现实历史中的渺小人物。

十三

老大哥、老大姐，不要吵了

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宣布赫鲁晓夫因健康原因退休并辞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担任新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改称总书记）。

年11月，周恩来率领中共党政代表团以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名义访问苏联。在访问期间，中苏两党高级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苏方表示，在中国关系的问题上，他们与赫鲁晓夫并无分歧。

年2月12日，苏联部长会主席柯西金在结束对越南的访问以后利用在北京过境的机会与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会谈。这是毛主席生前最后一次会见苏联高级领导人。中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和康生；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后来曾经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双方先就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以及相互配合反对美帝国主义等问题一般性地交换了意见。

然后，柯西金说，毛主席曾经提议，如果中苏两党进行最高级别的谈判，就可以解决一般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柯西金问，现在进行这样的会谈的时机是不是已经成熟。毛主席表示，中苏两党的论战还要进行“一万年”。

柯西金说：“我们之间的团结目前在上世界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是怀着十分尊敬

的感情的。我把这个问题讲得粗鲁一些吧。人打架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为什么打架。”

柯西金讲到了中苏分裂的危害：“我在国外同一批共产党人进行了非正式的谈话。他们表示了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西欧的普通党员的意见。……他们说，我们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斗争的人，我们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我们没有设想过，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会这样尖锐。这种斗争使我们外国的马列主义者处于一种瓦解的状态。本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用来反对本国的资本家、帝国主义者。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这样做，而要在地下的条件下，经常来考虑，到底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还是苏联共产党人对。……他们讲，我们产生一个问题：帝国主义之间有的时候就一些问题还能谈妥，为什么你们不能谈妥？我相信，现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我们全体苏联人民，中国人民，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军人，都在等待，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柯西金说，“我们之间共同的东西要比分歧的东西多得多。”然后，柯西金提议，可以把中苏之间的分歧“拖一拖”，放一放，“放一万年”。柯西金建议，如果中苏要辩论，可以另外办一个理论性刊物，双方的不同意见都拿到那个刊物上去发表。

然后，毛主席专门提到阿尔巴尼亚问题：“还有个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你们怎么解决呀？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会都不能开。

柯西金解释说，苏联方面试图改善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但阿尔巴尼亚方面以“漫骂”来回答。

毛主席坚持说：“我建议你们要取消从前对阿尔巴尼亚的那一套，说那一套错了。只要这样一句话就完了。”然后，毛主席补充说，“你们要我们参加什么会，你们得取消前年七月十四日攻击我们的公开信，去年二月那个报告，那个决议。只要说这些是

错误的，因此取消，那我们就合拢了。”就是说，要中国参加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除了苏共在阿尔巴尼亚问题必须满足中共的立场以外，苏共中央还必须推翻自己在1963年7月14日致全体苏共党员和党组织的公开信以及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于1964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关于国际共运团结问题所作报告中的立场。

柯西金只好答复说：“毛泽东同志，这是不可能的。”柯西金表示，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中国方面并不了解全部情况。

然后，双方就战争、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和支援各国革命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毛主席说：“我们不相信什么全面彻底裁军……不管是美国、西方世界也好，你们也好，我们也好……全部都是全面彻底扩军。”

柯西金反问：“毛泽东同志，你真的很严肃地认为，你们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比我们斗得多吗？”柯西金进一步说明，“如果讲到现在跟帝国主义所发生的冲突，现在所进行的这种反帝斗争，那么，这个斗争到处都是有我们参加的。……而且有我们的人参加，有我们的军队，有我们的武器参加，而且所有的事情中，我们都在那里冒风险。……我们认为，我们跟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斗争不比你们少。”在谈到中苏两党消除分歧、团结起来的前景时，毛主席说：“大概十年以后，我们两党可以团结起来。……客观情况通着我们要团结起来。这个帝国主义，它也是不以它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们不但不饶我们，也不会饶你们的。”“我们两国在十年到十五年以后会团结的。只要帝国主义动刀枪，向着你们也好，向着我们也好，我们就要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吵呀？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一手。”

谈话接近结束时，柯西金说，如果两党领导人经常见面，有些问题提前解决，那么两党之间停止论战“用不了一万年”。毛主席回答说：“缩小一千年……这是最大的让步。”

柯西金提议：“然后剩下来的那几千去掉三个零……这样的话，一切事情都好起来了。让我们为这个而奋斗吧。”毛主席回答说：“还要帝国主义帮助。可能把时间减少到七、八年，我们又团结起来了。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分裂嘛。”柯西金表示，苏方也不认为中、苏之间完全分裂了。

196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出席即将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在复信的称呼中最后一次使用了“亲爱的同志们”。

在复信中，中共拒绝了苏共的邀请，并表示中共对苏共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而苏共却“毫不悔改”。

3月29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来自世界各国的86个共产党、工人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当勃列日涅夫提到“以黎笋同志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以及“以阮氏萍为首的越南南方解放阵线的代表”参加了大会时，会场上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在谈到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勃列日涅夫说：“我们党和苏联人民真诚地希望同人民中国和它的共产党友好。……（我们）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中共领导一起，重新研究现有的分歧，以便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克服这些分歧的途径。我们确信苏中两党、两国人民终将克服一切困难，在为共同的伟大革命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走在同一个行列。”

讲到国际共运中的团结问题时，勃列日涅夫指出：“近几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我们对于分歧——只有我们的共同敌人才能从中得到好处——至今尚未克服表示深为遗憾。在我们看来，这既不符合任何一个兄弟党的利益，也不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苏共认为，促进我们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的团结，是所有共产党人的职责。苏共中央深信，共产主义运动所有队伍的团结越是巩固，国际反帝阵线就越有力量，世界革命的发展就越顺利。”

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这次全会，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工作做了调整，选举林彪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在谈到国际形势时，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苏共新领导集团，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们的路线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列宁，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他们正在联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将苏共二十三大关于中共以及国际共运问题的表述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对苏共的表述相比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苏共始终认为，苏共与中共的矛盾属于国际共运内部的矛盾，应该努

力在国际共运范围内加以解决，苏中分裂只有利于帝国主义，不利于国际反帝斗争，不利于世界革命。

而中共却认为，苏共已经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在国际上起着“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的作用，并且毫无根据地指责苏共“正在联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

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八届十一中全会重复了中共以往的立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但是，全会公报马上指出，这个“最广泛”的反美帝统一战线并不包括苏联：“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以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为标志，中共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将苏共和社会主义苏联作为自己在国际斗争中的主要敌人之一。从这个错误的估计出发，八届十一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在中共看来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对苏共应该采取的态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对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工贼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

就是说，中共不仅自己对苏共采取敌对态度，而且还要求与中共友好的各国革命政党对苏共也必须采取敌对态度，“必须划清界限”，“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并且坚决排除了在反帝斗争中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中共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把国际阶级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世界革命出现了新高潮，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斗争和群众性的反战斗争风起云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新的经济危机。如果中国和苏联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伟大的革命政党能够团结一致，联合起来打击帝国主义阵营，本来是有可能以此为契机，提前葬送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毛主席和他的同志们，错误地估计了苏共错误的性质以及当时苏联的社会性质，混淆了世界范围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抛弃了1965年2月会见柯西金时曾经提到的中苏“没有完全分裂”、帝国主义会“逼着我们要团结起来”的正确观点，在仅仅一年半之后，就采取了不仅与苏联为敌而且与当时仍然接受苏联领导或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多数为敌的极端错误立场！

中共对国际共运团结的破坏给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为后来曾经“同志加兄弟”的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种下了祸根。

1965年以前，中国是援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主要力量。当时，苏联对越南人民斗争的支持主要限于声援，所提供的物质援助不多。1964年8月，美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一手策划并制造了子虚乌有的“北部湾事件”（美国方面称之为“东京湾事件”）。中国政府当即发表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调整了对越南援助的方针。1964年11月，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将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讨论了向越南提供地对空导弹、坦克、大炮和鱼雷艇等问题。1968年以后，苏联给越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超过了中国的援助额。1965年至1973年，苏联

向越南累计提供了约10亿卢布的经济援助和20多亿美元类的军事援助，大约占苏联给各社会主义国家援助额的一半。

本来，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是有利于越南人民斗争早日胜利的好事。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在国际斗争上采取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立场，苏联加大对越南的援助，反而引起了中共方面的猜忌和不满。

1965年2月，柯西金在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时，号召社会主义国家将分歧撤在一边，在援助越南的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对此，中共中央在1966年3月20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说，“你们叫嚷的所谓联合行动，特别是在越南问题上的所谓联合行动，完全是一个骗人的圈套，其目的无非是要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你们一直配合美国搞和谈阴谋，妄图出卖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的轨道。”

1965年2月25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通过苏联驻华使馆就向越南提供援助问题向中国方面提出如下要求：1.希望中国方面允许苏联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约4000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2.请中国方面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供苏联的一个米格21歼击机大队使用；3.要求在中国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援越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中国政府认为这些要求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于3月10日拒绝了苏方要求。

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一次讲话中表示，苏联将履行自己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主义义务，目前许多苏联公民志愿奔赴越南为自由而战。1965年10月，周恩来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会谈时指出，中国方面不支持苏联志愿部队赴越参战的想法。

1966年3月，周恩来与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会谈。黎笋表示，越南方面正在考虑请求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志愿人员的名义向越南派出飞行员参战。中国方面表示，越南可以从苏联飞行员那里得到的还不足以补偿苏联会给越南造成的损失，苏联可能会把越南的秘密透露给美国。

这段史料如果属实，那么中国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带有挑拨离间的嫌疑了。

1966年4月，周恩来、邓小平与黎笋会谈。周恩来和邓小平向越方声明：你们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这对我们是个污辱。因此从现在起，在你们提苏联的援助的时候，不应再提中圉的援助。

对此，越南领导人表示：越南与中国对苏联的判断不同。你们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我们不这么看。越南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提出了委婉批评：越南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

1967年4月，范文同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向中方转达了苏联的建议：1.请求中国增加苏联援越物资的船运量，从每月一万吨增加到三万吨；2.请求中国开辟两到三个港口用于装卸苏联的援越物资。

对于前者，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答复此项提议；对于后者，中国方面说，目前越南的海防港并未遭到轰炸，因此苏联还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的港口。

据苏方资料，1969年初，中国方面拒绝运送苏方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迫使苏联在当年1至3月期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苏联外交部声明说，3月初，苏联方面的代表为通告苏联方面将要发出援越物资列车，多次求见中国有关部门。中方起初以“忙”为借口推托，旋即又在会见时以消息传递太

迟为由断然拒绝接受此项通知。苏方声明指责中国给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运输设置障碍。

当时，苏联一方面加强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也主张用谈判方法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1968年4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宣布同意派出代表与美国谈判；10月，美国约翰逊政府宣布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1969年1月，由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 and 南越阮文绍政权共同参加的巴黎和平谈判开始。

对于越南方面谋求用谈判手段达到使美国退出越南的目的，中国方面十分不满。中国方面多次提出，希望越南不要落入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共同设置的圈套之中。1968年4月至10月，中国领导人几次对越南领导人提出指责：认为越南政府接受美国关于和平谈判的建议事实上帮助了正在忙于国内总统大选的约翰逊，越南的妥协让步是落入了作为美帝帮凶的苏联圈套，使美帝掌握了主动权。中国方面甚至向越南方面表示：你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者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因此我们两党之间、两国之间对此已经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了。

巴黎和平谈判开始后，中国方面又曾经试图劝说越南方面，少花“外国”（苏联）的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后来的一系列事实发展表明，中国方面在这一时期对于印度支那战争、巴黎和平谈判以及整个国际形势的看法，有很多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由于中共在国际斗争方面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态度，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友好关系早在1968年就已经出现了裂痕。

中、苏分裂，让世界上许多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痛心疾首。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在临终前说：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老大哥、老大姐不要再吵了。

十四

关于“修正主义”

1968年8月，苏联与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采取果断行动，制止了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苏联与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的这次行动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资本主义复辟推迟了二十年，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有利于世界进步事业。

8月23日，周恩来在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为罗马尼亚国庆而举行的招待会时，借机发表声明，抨击苏联已经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但没有明确规定界江上江心岛的归属。苏联红军自1947年起一直在珍宝岛上巡逻。中方主张，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方一侧，属中国所有。从1967年起，中国军队也开始在该岛上巡逻；双方不时发生对骂、推搡、棍棒武斗等冲突。

1969年1月，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一个动用三个连的兵力伏击苏军的方案；经总参谋部、外交部、毛主席本人先后批准。3月2日，上岛的苏军巡逻队被预先潜伏在那里的中国军队伏击，损失惨重。3月15日至17日，双方再次发生武装冲突，战斗规模扩大到团级。

同年8月，苏军出动坦克和直升机在新疆塔城地区的铁列克提伏击了一支中国军队巡逻分队，被围的中国巡逻分队全部阵亡。

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参加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时与周恩来会晤。

会谈中，柯西金首先表示：“现在西方报刊和以美国为首的力量正利用一切办法使我们冲突起来。全世界的情报机构花费大量经费干这件事。以尼克松为首的反对派势力采取一切手段，使我们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冲突。未来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搞垮。”这里，柯西金依然称中国和苏联是“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针对柯西金的表态，周恩来表示，这次会谈只谈“关键问题”，也就是只谈边界问题。周恩来说：

“我们现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们不会侵略苏联。你们过分紧张了。……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是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柯西金对周恩来说，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呼吁和号召我们的人民进行战争，而是号召他们争取和平”。然后，柯西金略带讽刺地提到“我们没有发表过一个声明，要我们的人民勒紧裤带进行战争”。

柯西金说明了苏联方面的政策：“苏联不寻求同中国的战争。……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不愿意打仗，也没有号召人民打仗，正像中国国内有许多人不要战争一样。”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各自表达了不会针对对方发动战争的意愿，并就在有争议的边界地区避免冲突问题达成了谅解。

此前，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在大会上做了政治报告。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林彪说：“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越来越走下坡路。”这里，虽然重复了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

人”的提法，但是没有再提“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关于苏联，林彪认为：“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

这里，林彪表达了当时中共中央的观点（也就是毛主席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在苏联已经“全面复辟”，又因为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后的苏联对外“加紧侵略”、对内“加紧镇压”，就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

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也就是文革中所说的“两报一刊”）编辑部共同发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这篇文章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现在看来，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上台”与“资产阶级上台”之间关系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或者是过于简单化的，而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看法则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在当时的苏联，存在着一个官僚特权集团，这个官僚特权集团脱离劳动人民并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在苏联社会占着统治地位。但是，这样的官僚特权集团，存在于二十世纪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社会主义中国也存在（不仅在文革前存在，在文革期间也存在）。在这方面，社会主义中国（包括文革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与社会主义苏联没有本质区别。此外，苏联

的官僚特权集团也不是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才产生的，而是早在斯大林的时代就产生并且巩固了。

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僚特权集团独占对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广大劳动群众生产剩余产品却不占有剩余产品。在这个意义上，官僚特权集团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也就是阶级关系。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

但是，说一个社会是阶级社会，并不等于说，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只是阶级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别的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

在一切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都剥削劳动者；在大多数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攫取剩余产品的主要方式是“超经济强制”（即通过暴力直接占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是通过雇佣劳动的方式来剥削劳动者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通过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来获得购买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资。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力是商品，可以自由买卖。

劳动力商品化的前提是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中占统治的地位。就是说，绝大多数劳动产品都是商品，由独立的消费者、生产者（无论它们在法律上是私有的、“集体的”还是国有的）自由买卖；商品交易的数量和价格也完全由市场供求来决定。

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产品就表现为剩余价值（即可以作为商品与货币交换的剩余产品），对于具体的资本家来说，就表现为利润。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要获取剩余价值（利润），并将剩余价

值（利润）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资本积累，其余则用于资本家的挥霍浪费。

那么，赫鲁晓夫时代和勃烈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是不是发生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历史上苏联的生产关系是怎样的。1936年的苏联宪法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基本确立。从那时起，直至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除了战争期间以外，苏联国内的生产关系没有大的、根本的变化。

苏联始终坚持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个体经济除了在农业生产中仍然显著存在以外，在国民经济的其他各部门中基本消失。

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国家掌握了全部的工业生产资料，决定绝大部分能源、原材料在生产企业间的分配，对企业所生产的品种和产量提出要求，决定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并决定国民收入在消费和积累之间分配的重大比例关系。这就是说，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不再是商品，绝大多数消费品的价格也不再由供求关系决定；可见，商品货币关系在苏联经济中不占统治地位。

苏联的劳动者享有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广泛的社会权利。苏联的企业不能任意开除工人，苏联劳动者的劳动力不是商品。

在苏联经济中，工业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都由国家统一分配，企业不能自由销售。所以，苏联的企业是按照国家计划为“使用价值”而生产，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苏联的企业虽然也使用成本、利润等核算指标，但是这些指标背后的经济关系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完全不同，苏联的企业也不能自由支配它们所生产的全部“利润”。

以上这些苏联生产关系的基本特点，不仅存在于斯大林时代后期，而且贯穿着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前半期。

苏联生产关系的基本特点，也是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关系的基本特点。

在毛主席和中共对苏联的批判中，从来没有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苏联既没有进行私有化，也没有取消计划经济，劳动者在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权利不仅没有被取缔，甚至还有所发展。说当时的苏联就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甚至是“全面复辟”，是毫无道理的。

既然苏联并没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无所谓“资产阶级专政”，而说苏联是“法西斯专政”，更属于无稽之谈。只有资产阶级评论家才污蔑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与法西斯主义一样黑暗的“极权主义”“专政”。

至于“修正主义”，原来只是指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运中的一种改良主义思潮，指的是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运中的某些派别为了工人阶级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短期利益而放弃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列宁在其有生之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修正主义”这个词的。

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所制定、中共和苏共都参加签字的《莫斯科宣言》中，对修正主义”的定义是：“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但《莫斯科宣言》也明确指出，“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样，都属于“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机会主义流派”。

也就是说，无论是“修正主义”还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都属于国际共运内部的“流派”；无论是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都是国际共运内部的斗争，属于世界范围的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是中共，首先将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上升为敌我矛盾，继而又将与苏共的分歧上升为敌我矛盾，到了1969年、1970年，更是登峰造极，将社会主义苏联与“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相提并论，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和政治概念失去了一切严肃的意义。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马列主义队伍成长的过程中，许多同志出于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在对苏联以及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照搬了毛主席的一些看法和表达方式。随着中国马列主义队伍的发展，尤其是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这种认识上的缺陷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障碍，妨碍着马列主义青年正确地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一部分同志，由于将“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混淆，错误地认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就是“最坏的资本主义”，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在今日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官僚资产阶级”（所谓的“中特”），而真正的资产阶级还没有上台；“官僚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他们所理解的“修正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不如“真正的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真正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对劳动人民更加有利。在这样的同志中，有那么一部分人，幻想在中国可以建立一种“更好的”、不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进而得出中国应该首先进行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事实上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他们

在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上都与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站在相同的立场上，事实上堕落为自由派的帮凶。

今天，继续混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马列主义队伍在政治上进一步发展、在思想进一步成熟的一大阻碍。这种阻碍，正日益起着消极的乃至反动的作用，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要前进，就必须扫除障碍，轻装上阵，一切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实际出发，从而建立起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斗争策略及方针。

十五

历史的教训

1969年2月，毛主席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人到自己的住处，召开国际形势座谈会。此后，从当年3月至10月，陈毅等四人在中南海一共开了24次会，向中共中央提供了三份国际形势分析报告。这就是所谓的“四老帅国际形势务虚会”。

在务虚会上，所谓“四老帅”为中国彻底放弃社会主义外交路线、投靠美帝并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好外部条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根据。

“四老帅”认为，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西方，不愿意和中国打，使苏联坐收渔利。他们据此得出结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主张中国在战略上打“美国牌”，实行“东联孙吴（美国），北拒曹魏（苏联）”的国际战略方针。陈毅还提出，中、美间应进行高级会谈，中方可以不提先决条件。

毛主席请“四老帅”分析国际形势，这是中国在与苏联彻底破裂后即将对外交方针做又一次重大调整的先兆。就在当年四月份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在强调反对“苏修”的同时，仍然称美帝国主义为“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对此，周恩来在向“四老帅”说明毛主席意图时，暗示他们，不要怕与九大“唱反调”。

以前，我们在介绍斯大林问题时，曾经指出，斯大林既是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的领袖，也是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总代表。同

样地，毛主席既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中国的官僚特权集团的总代表。随着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失败，在毛主席个人的政治角色中，作为人民领袖和革命领袖的成分越来越少，作为官僚集团总代表的成分越来越多。

在其他文章中，我们曾经分析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阶级力量对比对继续革命派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勉强发动的。整个的党政系统的官僚特权集团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反对文革；

劳动农民在政治上根本没有发动起来；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状态。继续革命派在社会上的群众基础仅限于城市非熟练工人（临时工、学徒工）。此外，大批“地富反坏右”子女出于政治投机的目的混入了造反派；这些人，在文革失败后往往摇身一变成为鼓吹资本主义复辟的自由派旗手（王希哲在一次采访中曾经提到，“文革要整‘走资派’，受了共产党革命利益真诚要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和对共产党的革命和干部心怀仇恨要乘机‘打着红旗反红旗’报复的民众，混杂起来组成造反派”。

在如此力量对比劣势的情况下，毛主席为了发动文革时增大胜算，力图与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官僚集团达成妥协：毛以林为接班人，林助毛打倒刘。结果，刘少奇是打倒了，但军队官僚集团与党政官僚集团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当1967年上半年造反派群众试图在各省市夺权时，地方的军队官僚支持、偏袒地方的党政官僚。武汉“七二〇事件”爆发，标志着继续革命派已经遭遇了无法克服的阻力，总退却已经无法避免。到1967年底，毛主席被迫抛弃王力、关锋、戚本禹，文革实际上已经失败。

到了这个地步，毛主席已经没有了和官僚特权集团彻底决裂的本钱。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可能在军队官僚集团、党政官僚集团之间周旋，为继续革命派将来卷土重来争取一点机会。

1970年4月，毛主席与林彪在苏州会谈。据林彪秘书回忆，毛主席问林彪：“周总理年龄大了，对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林彪没有说话。毛主席再问：“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准备把班交给谁？”林彪还是没有说话。毛主席又问：“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林彪说：“还是要用跟您一起上井冈山的红小鬼。”在另一个版本的回忆中，林彪的回答是：“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黄、吴、李、邱指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就是要防止笔杆子、知识分子掌权）

在这次会谈中，毛主席实际上向林彪提议，未来把权力再交给继续革命派。林彪委婉拒绝了。

据资产阶级历史评论家分析，这次会谈是毛、林破裂的开始。据说，这次会谈后，林彪已经明确知道，林、毛决裂不可避免，林彪与叶群（林彪夫人）相顾而泣。

此后，毛、林关系一步步恶化，终于发展为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对毛主席的打击很大。林彪和追随他的军队官僚系统垮了以后，党政官僚集团完全占优势。周恩来已经病重。邓小平既是党政官僚集团中“众望所归”的人物，又是军队系统里面除毛主席以及已经不管事的朱德以外资历最深的人物。原有的军队、党政官僚集团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格局完全被打破。从此以后，无论毛主席主观上愿意不愿意，他的内外政策必须主要反映官僚特权集团的利益。

在国际上，当时最符合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长远利益的政策，就是放弃对苏联的敌对立场，与苏联联合起来，打倒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关于这个前景，后面再分析）。但是，且不说当时的中共领导集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愿，即使有这样的意愿，由于这时已经将苏联定性为“社会

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没有留下任何回头的余地，骤然改变方针，对内对外都无法解释。

第二种国际战略方针就是继续执行九大制定的国际路线，既反美帝，也反“苏修”，既对苏联保持敌对立场，也不与美帝在国际问题上合作。如果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官僚集团继续掌权，那么，哪怕是为了加强军队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林彪集团也很可能保持整个社会的备战姿态。如果是这样，中国未来可能发展为类似朝鲜的“先军政治”的体制，在国际上还不失为一支反帝力量。另一方面，如果实行这种战略，中国同时面临美国、苏联两个国际敌人，且军费负担沉重，国内经济会比较困难，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可能长期得不到改善。

中国后来实际上实行的是放弃世界革命、联美反苏的一条反动外交路线。这条外交路线既符合官僚特权集团的短期利益：不必再提心吊胆准备世界大战，而是可以专心于“经济建设”（资本积累），并在改善与西方关系过程中首先改善自己的生活；也符合官僚特权集团的长远利益：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好外部条件。

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尼克松访华结束时中、美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双方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就是，中、美双方都反对苏联或苏联倡导的国家集团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取得主导地位。

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在周恩来所作的十大政治报告中，不再称美帝国主义为“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淡化了反帝的内容，而是强调“第三世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共虽然在口头上高喊反对“美苏两霸”，但是在私下，中共领导人多次向西方领导人表示，此时中共只是在口头上反对美帝，中共在国际上真正反对的对象只有一个——苏联。

1973年2月17日，毛主席在北京会见基辛格。基辛格说：“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主席表示：“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有时我们也要讲点，不讲不行呢。”就是说，到了七十年代，中、美双方在宣传上相互攻击仅仅是为了欺骗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再代表各自统治集团的真实意图，用毛主席、周恩来1972年2月会见尼克松时的话说，“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一类的话都属于放“空炮”。

毛主席主张支持法国的右派蓬皮杜政府继续执政，反对由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左翼联盟，因为当时后者主张对苏联友好、反对扩充欧洲军备。毛主席还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也就是提议要建立一条横跨北半球的对苏联的包围圈。对此，基辛格表示：“我们的观念十分相似。”

1974年1月，毛主席会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提到的“一条横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条线”周边的“一大片”，主张“一条线”和“一大片”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联。

1974年10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发言，阐述中国的外交方针，声称“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其恶劣”。资产阶级历史评论家在分析邓小平的发言时认为，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划分三个世界，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主旨……这就将苏联最大限

度地孤立了起来。此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实质已只是一种形式上、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国主义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

可以说，自1972年起，中国已经在事实上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外交路线，不仅不再以世界革命作为国际斗争的最高任务，事实上也停止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是与美、欧、日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一门心思地反对和孤立社会主义苏联，客观上充当了国际反革命的伙伴。

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曾经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自1968年起，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进入高潮，法国一度出现革命形势。1969年，智利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尝试；后来虽然失败，但是在南美洲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

1974年，葡萄牙爆发革命，葡萄牙殖民体系瓦解。1975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取得彻底胜利，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完全解放。

到了七十年代后半期，非洲和亚洲出现了一批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包括：阿富汗、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即南也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莫桑比克、贝宁、刚果人民共和国（现为刚果共和国或刚果（布））、安哥拉。此外，当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还有十几个自称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实行某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与苏联友好并从苏联获得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

七十年代，美帝国主义焦头烂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普遍陷入了难以克服的停滞膨胀危机。

1971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之间维持固定汇率、战后实行了26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从1971年至1980年，美元按黄金计价贬值了约20倍。

1973年的石油危机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沉重打击。1973年底，为了节约能源，英国政府被迫宣布实行“每周三天工作制”。1974年初，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导致英国保守党政府垮台。1978年，英国各行各业工人相继罢工，英国经济几乎完全瘫痪。当时，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对部分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渡过危机。在工人阶级斗争与经济危机的共同打击下，七十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已经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如果中国和苏联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六十年代后能够始终团结一致，相互合作，相互帮助，那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到了七十年代就会强大得多。如果中国和苏联共同支援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不是相互拆台，到了七十年代，就可以与一大批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或向往社会主义的亚非拉国家结成联盟，将它们拉入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大大缩小帝国主义国家可以获得的世界市场及能源、原材料来源。失去了来自广大亚非拉地区的超额剩余价值，当时已经严重动摇的整个帝国主义阵营就很有可能崩溃。

由于中、苏两党两国由分歧发展到分裂，世界人民失去了一次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伟大历史机遇。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次惨痛的教训。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人民生活在新自由主义和反革命复辟的黑暗年代；国际资产阶级向劳动人民疯狂进攻，反攻倒算，将侵略战火从巴尔干、高加索一直烧到中东和北非，使得亿万劳动人民跌入贫困和死亡的深渊。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残酷现实的教育，也经过长时间的积蓄和准备，世界反帝斗争的新高潮已经开始了。今天，以俄罗斯为首的世界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反帝阵营已经在斗争中取得了伟大

的胜利，美帝国主义以及整个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彻底土崩瓦解的日子已经不遥远了。

中国共产党人在1963年曾经畅想的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的“世界革命风暴”，现在正由亚、非、拉、俄广大地区的人民团结起来的反帝斗争实现着。这种反帝斗争，将要从根本上摧毁已经在世界上肆虐了几百年的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当这个体系被埋葬的时候，作为西方帝国主义体系附属品的中国资本主义也必然随之灭亡。

到那时，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就到来

了。

